

全球智库半月谈

让我们停止贸易逆差的指责游戏

模拟美欧贸易战：关税难以改善美国全球贸易差额

美-刚“矿产换安全”协议为何事与愿违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我们的工作时长也在增长

芯片法案对美利益保障及废除对美投资环境之影响

移民和政治重组

贸易与国内冲突

本期编译

廖世伟

刘铮

熊春婷

薛懿

赵元彬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弦	大宗商品
	陈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王琬婷 邮箱：wangwanting1@ucass.edu.cn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全球热点

让我们停止贸易逆差的指责游戏 6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及其复杂经济逻辑，并指出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这一现象既受到国内因素（如低储蓄率和持续的财政赤字）的影响，也与国外因素（如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联邦预算赤字和家庭储蓄率的长期低迷是关键国内因素，而中国通过抑制消费和促进储蓄的政策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反驳了“美国贸易赤字完全是外部因素导致的”这一观点，强调国内财政政策的失灵同样不可忽视，并提出单纯依靠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无法有效解决贸易赤字问题，而是需要通过财政调整和政策改革来改善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模拟美欧贸易战：关税难以改善美国全球贸易差额 11

导读：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对欧盟国家征收关税来缩小双方的商品贸易逆差，但这样做的代价是美国和几乎所有欧盟经济体都将面临更高的通胀和更低的 GDP。本文使用 G-Cubed 经济模型预测了美国在现有关税基础上额外对欧盟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税措施对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举措将损害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而欧盟的报复将进一步放大这些负面效果。特朗普政府还表示，它将根据所谓“互惠”政策，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关税范围。这一政策将进一步瓦解战后国际贸易架构，对美国 and 世界都将造成不利影响。

美-刚“矿产换安全”协议为何事与愿违 18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之间“矿产换安全”协议的潜在风险与挑战。研究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关键矿产（钴、铜、钽）的主要生产国，这些资源对美国的能源和国防技术很重要，但其长期处于政治动荡和内战状态，其复杂的种族冲突、系统性腐败和脆弱的基础设施使得美国难以获得稳定安全的矿产资源。美国应优先修复与稳定国家的矿产合作关系，而非通过军事援助手段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以获取矿产。

芯片法案对美利益保障及废除对美投资环境之影响 21

导读：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自通过以来，已成功吸引全球顶级半导体公司巨额投资，推动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迈向前沿，并显著增强国家安全。该法案通过慷慨的税收抵免等激励措施，克服了在美国建立和运营半导体制造的高成本障碍，引发了远超预期的投资激增。尽管面临关税等替代方案的挑战，但 CHIPS 法案在刺激投资、降低成本及提升竞争力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本文旨在深入分析 CHIPS 法案的成功要素、面临的挑战及改进方向，强调保留并优化该法案对于维护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经济理论

并非所有的房地产周期都是相同的：房地产暴涨的宏观经济后果 26

导读：本文用了 68 个国家 1970 年到 2023 年的数据集证明，尽管房地产扩张可以短期促进经济增长，但平均而言暴涨式的扩张会导致中期经济增长下降。放松土地使用规定和培育鼓励住房建设的商业环境有助于缓解住房市场低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移民和政治重组 31

导读：本文分析了 2004 年欧盟扩大后移民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基于行业移民流动与地区就业结构构建暴露指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移民暴露地区对右翼反移民政党（如 UKIP）和脱欧支持显著上升，对工党支持下降；选民态度趋保守，政治话语中移民议题负面讨论增加，保守党在受冲击选区更关注移民。移民冲击推动政治冲突从经济再分配转向文化认同分歧，选民联盟沿文化维度重组，在移民影响强烈地区尤为明显。研究发现，移民通过提升文化议题显著性促使英国政治从阶级分化转向身份驱动，为理解民粹主义及脱欧提供了全新视角，警示了文化分裂对政策的潜在影响。

贸易与国内冲突 41

导读：这篇论文研究了内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它量化了内战对贸易的抑制作用，并通过结构引力模型探讨了背后的机制。一方面，贸易开放可能通过威慑机制降低内战风险，因为国际贸易带来的预期收益会阻止冲突；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可能通过保险机制降低内战的机会成本。论文还研究了内战对未卷入冲突的邻国贸易的溢出效应，发现这种溢出效应极为不利。此外，论文考察了内战影响的持续性，发现其影响随时间高度持续且随冲突持续时间增加而增强。研究使用了 142 个国家 1989-2006 年的数据，发现内战可使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减少超过 4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我们的工作时长也在增长 47

导读：人们通常期望技术进步能减轻工作负担。但随着人工智能融入工作场所，早期证据表明了一个悖论：许多配备人工智能的员工非但没有减少工作量，反而比以往更加忙碌。本专栏研究了 AI 暴露度、工作日长度、时间分配和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尽管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和授权可以让员工更高效地完成同样的任务，但作者发现，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职业的员工工作时间更长，花在社交和休闲上的时间更少。

本期智库介绍 51

让我们停止贸易逆差的指责游戏

Maurice Obstfeld/文 赵元彬 / 编译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及其复杂经济逻辑，并指出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这一现象既受到国内因素（如低储蓄率和持续的财政赤字）的影响，也与国外因素（如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联邦预算赤字和家庭储蓄率的长期低迷是关键国内因素，而中国通过抑制消费和促进储蓄的政策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反驳了“美国贸易赤字完全是外部因素导致的”这一观点，强调国内财政政策的失灵同样不可忽视，并提出单纯依靠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无法有效解决贸易赤字问题，而是需要通过财政调整和政策改革来改善储蓄与投资的平衡。编译如下：

所有掌握基本算术能力的人都认同，美国经常账户贸易平衡——衡量其贸易逆差的最广泛指标——等于美国储蓄减去投资。但共识也仅止于此。

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美国储蓄率较低，部分原因是联邦预算赤字在 2024 年达到 GDP 的 6.4%，这可能是造成美国长期且庞大的贸易逆差的一个因素。然而，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支持者对此强烈反驳。他们说，美国是无辜的受害者。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而美国的前任领导人们却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地允许其他国家将这些政策强加于美国的经济之上。他们认为，为了恢复贸易平衡，现在是时候收回控制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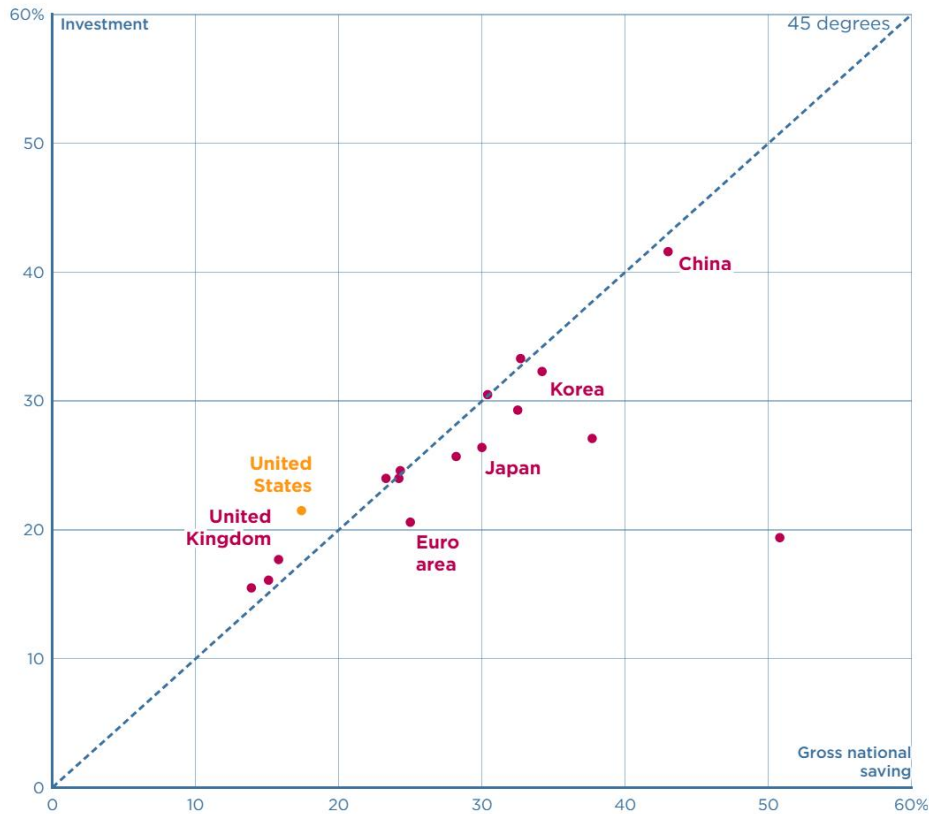
任何指出美国向国外借款是由于其储蓄低于其投资的人，都面临这样的反驳：外国储蓄超过投资的金额与美国储蓄不足的金额相等（这是数学上的必然结果）。但这两种现象都无法解释全球失衡模式的根源，因为储蓄率和投资率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基本驱动因素。只有那些因素才能被合理地视为被美国逆差的“原因”。

这些潜在的原因很多：有些确实源自国外，但有些纯粹是国内原因。在贸易和资本市场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无论是政府政策、自然灾害还是人为冲击——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在全球均衡状态下，外国对美国的资金供应和美国对这些资金的需求必须相等：美国的赤字可以来自供给增加、需求上升或两者皆有。

中国抑制国内消费、促进储蓄而不是投资的政策肯定会通过世界市场传导，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这些政策可能压低全球利率，推高海外资产价格，导致外币升值。

但美国因素也很重要。例如，美国个人储蓄率在 1960-1980 年间从通常高于 10% 的水平下降到疫情后数据所示的平均低于 5% 的水平。连年的联邦预算赤字也是国民储蓄率低迷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因为美国的投资没有向下的趋势，因此，美国出现了数额庞大且难以化解的经常账户赤字。

图 1 各国国民储蓄总额和国内投资占 GDP 的百分比，2023



注：在国际主要借贷国中，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较低。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4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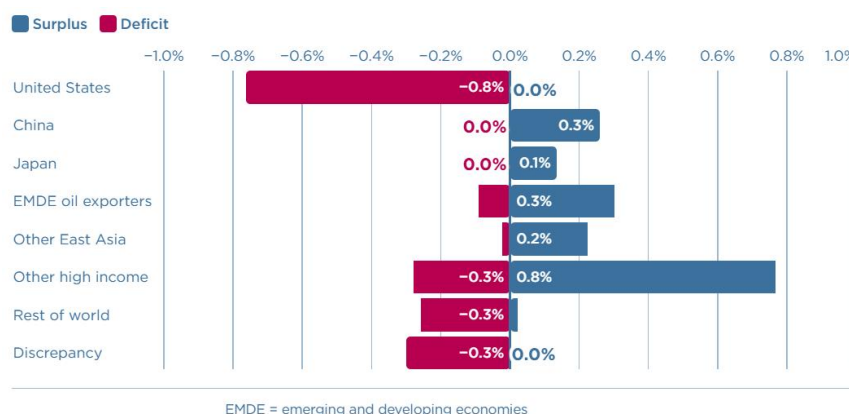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了美国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率（占 GDP 的百分比）与全球资本市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对比。像美国这样位于 45 度线（投资大于储蓄）以上的国家，存在经常账户赤字；而位于该线下的国家则存在盈余。

以国际标准衡量，美国的储蓄总额非常低。如果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增加储蓄是导致美国低储蓄率和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预计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也会相当低。然而，图 1 显示情况并非如此。

一些分析人士声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高储蓄率“迫使”美国的储蓄率保持在低位。除了鼓励美国家庭支出的资产价格效应外，这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对外资流入的一种反应，否则外资流入将导致失业。然而，这一说法与事实相悖。例如，2000 年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尽管贸易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7%，高于 2024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赤字的 3.1%，但美国实现了联邦预算盈余，且失业率约为 4%。

美国若进行财政调整将导致美元贬值和贸易逆差减少；如果美联储降息，对就业的任何负面影响都可能被抵消。美国在经济政策上并非无能为力。在经济衰退期之外，美国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大多反映了财政功能失调，而非有意图的支持经济计划。

图 2 按国家或地区分列的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占全球 GDP 的百分比，2023



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远未赶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差异”条表示全球经常账户数据的统计差距——“缺失赤字”。它既可以代表少统计的赤字，也可以代表少统计的盈余和更大的少统计的赤字的组合。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4 年 10 月

尽管中国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出口补贴，但其贸易顺差却远不及美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如图 2 所示，2023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美国贸易逆差的 34%。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的政策都相当开放，他们的贸易顺差总和大约相当于当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由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造成”的，也不意味着它主要是由中国的贸易顺差造成的。

一些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由于其开放的资本市场，美国成为像中国这样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国家的资本流入的最受欢迎的目标。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尔·佩蒂斯曾写道：

持续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必须购买外国资产来平衡这些顺差。出于这一目的，美国资产尤其具有吸引力，而且美国几乎允许这些国家不受限制地获得这些美国资产。因此，这些贸易顺差国更愿意用贸易顺差换取美国的资产，这也意味着美国必须出现相应的贸易逆差。

与佩蒂斯的观点相反，各国可以在不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用非美国资产而不是其出口的方式来支付以获得美国资产。

图 3 美国占全球外部资产和美国占全球 GDP 的百分比 1995-2023



注：在过去三十年中，贸易伙伴在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份额一直在接近或低于美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

来源：Gian Maria Milesi-Ferrett，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布鲁金斯学会，2024 年 1 月 13 日（基于 Philip R. Lane 和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2018 年。“重新审视国家外部财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第 66 期，189-222 页）

然而，除了这一概念上的缺陷之外，佩蒂斯的观点在经验上也面临挑战。如果各国对美债有强烈的偏好，那么我们会预期其他国家将其大部分外部资产投资于美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图 3 显示了世界其他国家投资于美国的外国资产的份额。这一比例在本世纪上半叶徘徊在 19% 左右，然后在 2014 年左右随着美元升值（提高了对美国债权的相对价值）及美国股市的优异表现上升至近 25%。总体而言，这些份额与美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相当，后者在 2023 年为 25.8%。

无论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家认为按照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关税范围设定关税，不会对其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关税可能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一些影响，但它们不太可能极大地改变储蓄-投资平衡或将使其向某一特定方向倾斜。

近期的三项宏观经济动向可能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一是欧洲意识到增加国防开支势在必行，德国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放宽严格的财政规则的努力便是例证。第二个是中国宣布的加强财政刺激以应对美国关税和国内经济困境。第三种可能是美国经济衰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出境，以及政府的大规模裁员和合同取消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经济不确定性所导致。经济衰退可能会通过压缩消费来增加储蓄，而且肯定会抑制投资——即使降低贸易逆差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这也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实现这一目标理想的方法。

本文原题为“Let's stop the trade deficit blame game”，作者为 Maurice Obstfeld。本文属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工作论文，发表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原文链接：<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5/lets-stop-trade-deficit-blame-game>。

模拟美欧贸易战：关税难以改善美国全球贸易差额

Warwick J. McKibbin & Marcus Noland/文 薛懿/编译

导读：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对欧盟国家征收关税来缩小双方的商品贸易逆差，但这样做的代价是美国和几乎所有欧盟经济体都将面临更高的通胀和更低的 GDP。本文使用 G-Cubed 经济模型预测了美国在现有关税基础上额外对欧盟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税措施对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举措将损害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而欧盟的报复将进一步放大这些负面效果。特朗普政府还表示，它将根据所谓“互惠”政策，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关税范围。这一政策将进一步瓦解战后国际贸易架构，对美国 and 世界都将造成不利影响。编译如下：

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对欧盟国家加征关税来缩小其对欧商品贸易逆差，但代价是美国和几乎所有其他欧盟经济体都将面临更高的通胀和更低的 GDP。

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这些措施对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几乎没有影响。

自今年 1 月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推迟和威胁要实施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贸易保护政策，包括对进口钢铁、铝和下游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欧盟表示将予以反击，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首先针对波本威士忌、牛仔裤和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等标志性产品，必要时还将扩大清单范围。特朗普则威胁若欧盟采取行动，将对欧盟的酒精饮料征收 200% 的关税。

特朗普还在 2 月 26 日威胁要对所有欧盟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称欧盟 27 国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算计”美国。他补充说：“他们确实占了我们的便宜……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汽车，基本上不接受我们的农产品。他们总能找出各种拒绝的理由。而我们却对他们全面开放。”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类关税措施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不仅会推高价格，还会减缓经济增长。这还是在未考虑欧盟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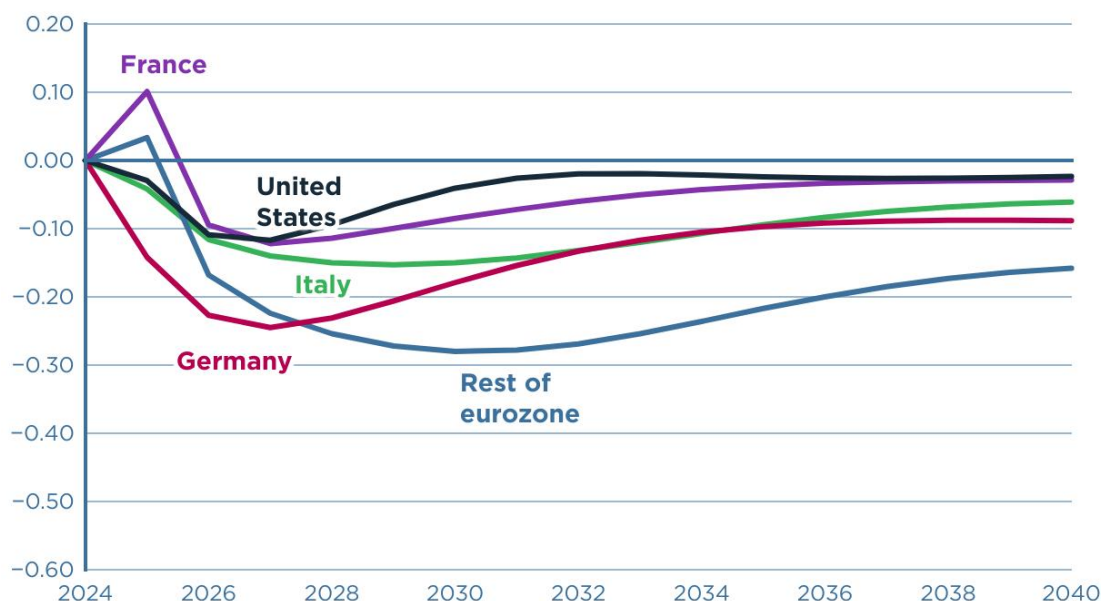
为了评估美欧贸易战的潜在全球影响，我们使用 G-Cubed 经济模型预测了美国在现行关税基础上对欧盟商品额外征收 25% 的关税的影响，以及欧盟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所带来的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欧盟的报复采取“以牙还牙”的形式，尽管在过去的贸易争端中，欧盟对美国的行动通常更为精准的放矢。

该模型单独分析了欧盟的三大 G20 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而那些较小的、通常贸易开放程度更高的欧盟成员国则被汇总为“欧元区其他国家”。图 1 显示了有无报复措施情况下贸易战对实际 GDP 影响的影响，以各个经济体每年相对于基准预测的偏离程度表示。（[更详细的数据面板可在此处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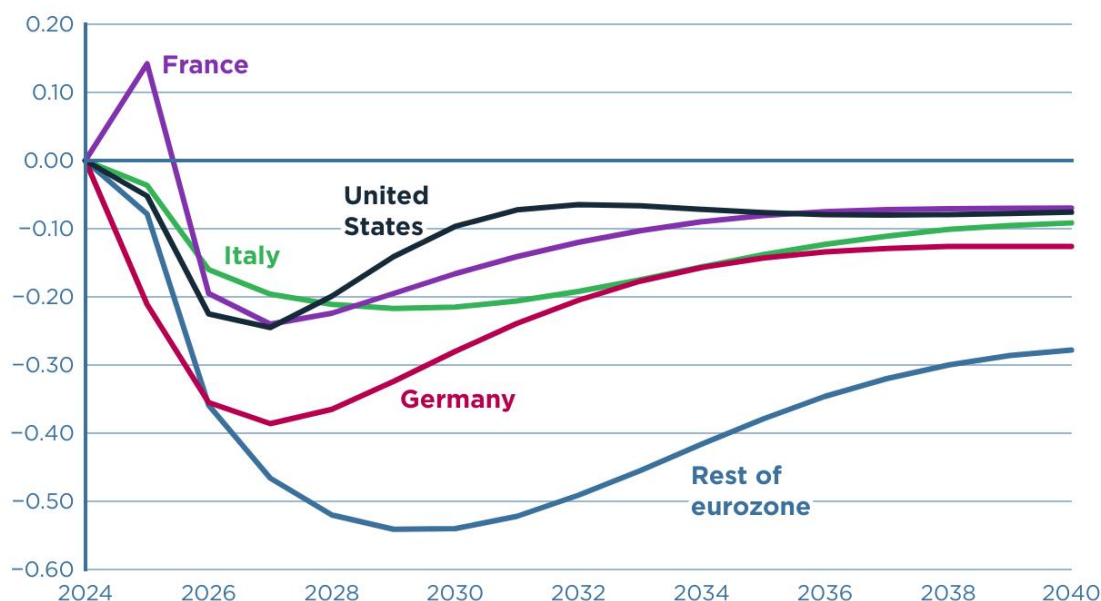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关税举措将损害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导致实际 GDP 低于不征收关税的情况。欧盟的对等报复将放大这些结果。

图 1 对欧盟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和欧盟 GDP 降低（无论是否报复）

a. Projected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DP from baseline forecast for each economy without retaliation, 2024-40



b. Projected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DP from baseline forecast for each economy with retaliation, 2024-40



Source: Warwick McKibbin, Megan Hogan, and Marcus Nol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PIIE Working Paper 24-20.

法国和小型欧元区国家在初期（约一年内）呈现 GDP 暂时上升的反常现象。这是因为相对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欧元贬值（由欧洲范围内的贸易冲击引起）对法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关税。鉴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在贸易和生产结构方面的差异，这一贬值最初将抵消关税对这些国家 GDP 的影响。

由于欧洲和全球投资放缓，德国的耐用品出口将遭受重大打击，因此德国的 GDP 将明显下降。耐用品行业是私人投资的重要投入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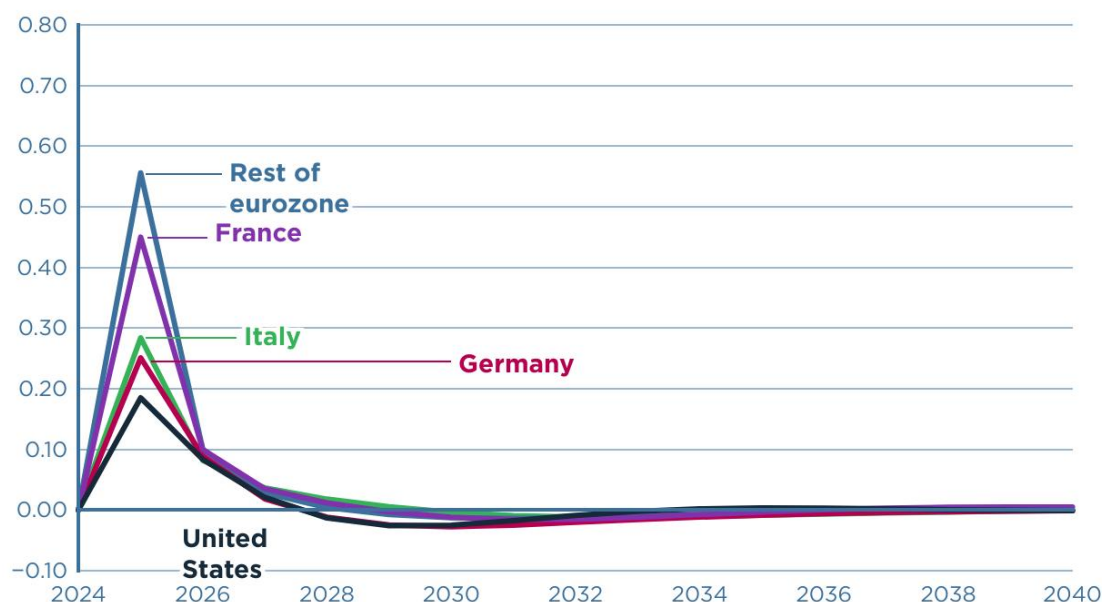
四年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小国将受到最严重的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复措施将加深所有国家的经济损失。

除非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并影响金融市场，或者与美国大规模驱逐出境政策叠加，否则单凭关税本身不太可能使美国陷入衰退。尽管如此，考虑到衰退担忧加剧的背景，任何减缓美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都非明智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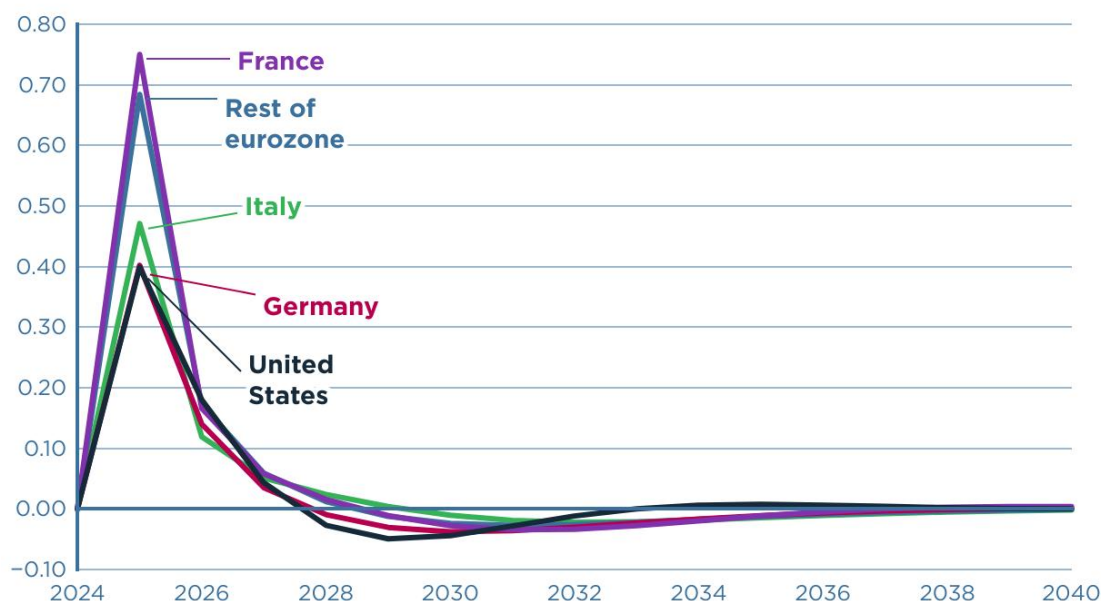
此外，如图 2 所示，该政策将导致美国和欧盟的通胀暂时飙升，并将因报复措施而变得更糟，图 2 显示了与每个经济体基准预测的百分点偏差。

图 2 对欧盟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和欧盟通胀上升（无论是否报复）

a. Projected percentage point change in inflation from baseline forecast for each economy without retaliation, 2024-40



b. Projected percentage point change in inflation from baseline forecast for each economy with retaliation, 202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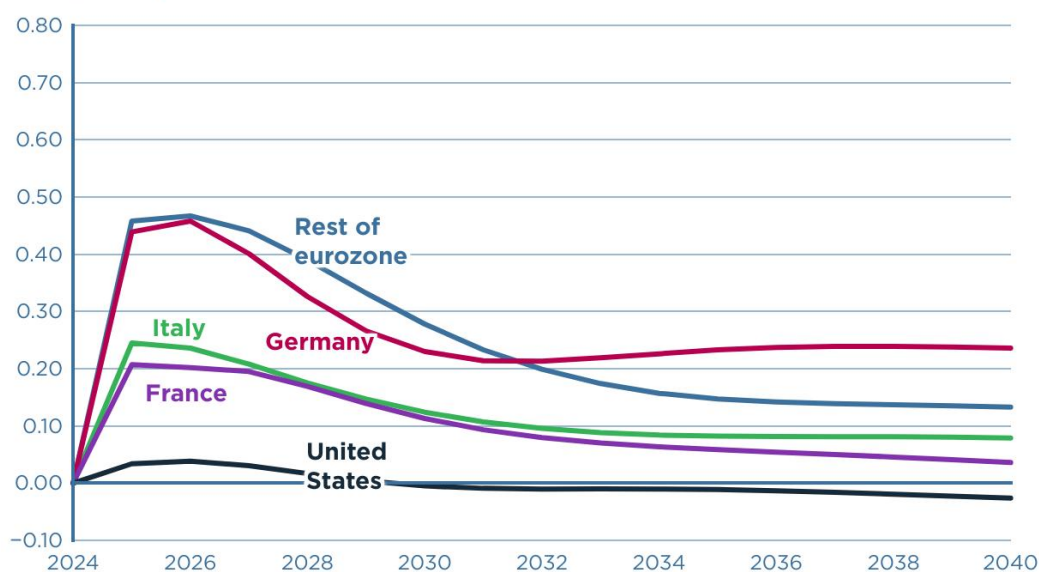
Source: Warwick McKibbin, Megan Hogan, and Marcus Nol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PIIE Working Paper 24-20.

与此同时，提议中的 25% 对欧关税几乎不会对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产生任何影响——这是特朗普言论中经常提到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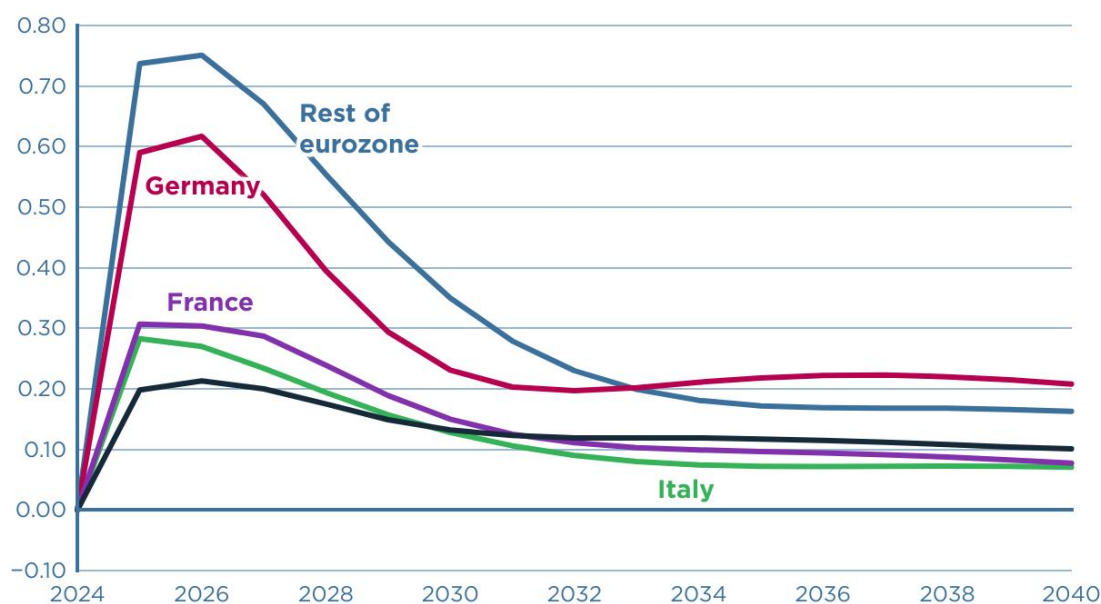
如图 3 所示，相对于基准预测，该措施将增加欧洲的全球贸易顺差。欧元贬值带来的全球竞争力增长，以及国内需求收缩，将超过关税的影响。如果采取报复措施，美元和欧元相对其他货币都会贬值，而在美欧经济双双收缩的情况下，美国（暂时）和欧盟（永久）的全球贸易差额将会增加。

图 3 对欧盟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美国全球贸易差额影响不大。如果采取报复措施，美国

a. Projected global trade balance as a percent of GDP without retaliation, 2024-40



b. Projected global trade balance as a percent of GDP with retaliation, 202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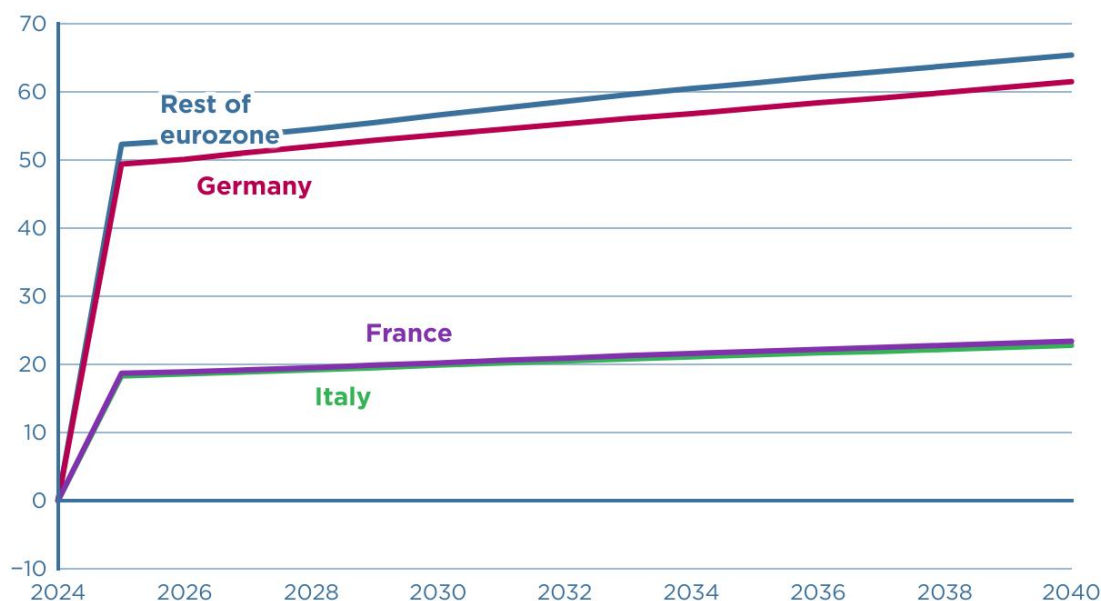
Source: Warwick McKibbin, Megan Hogan, and Marcus Nol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PIIE Working Paper 24-20.

美国目前与欧盟的双边商品贸易逆差每年超过 2000 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超过 1000 亿美元。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双边差额对一个经济体的整体健康并不重要，但特朗普认为，对美国来说贸易逆差是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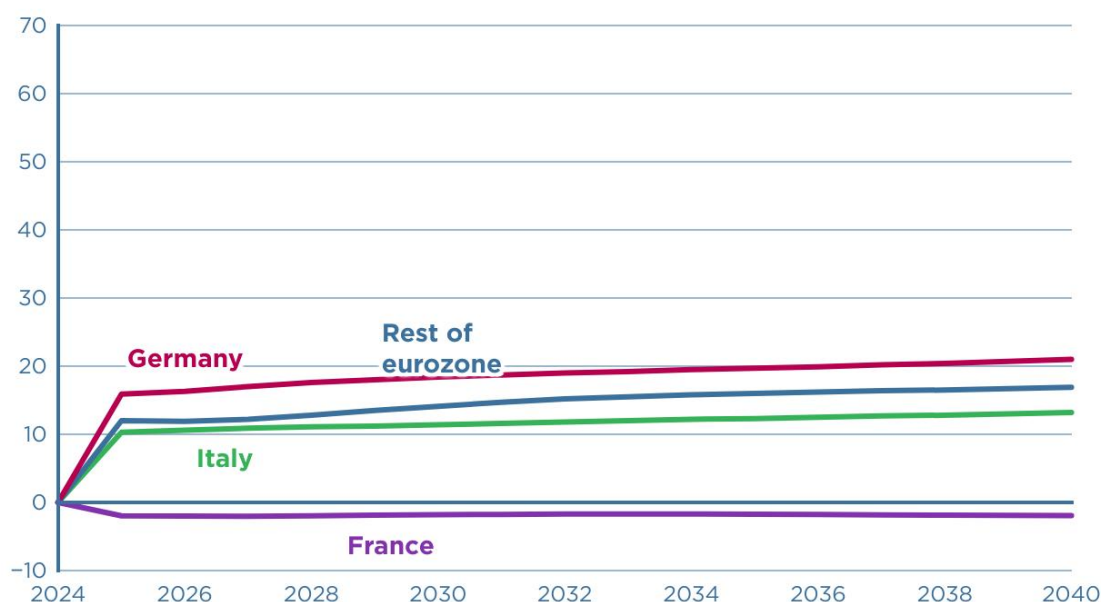
如图 4 所示，如果美国对欧盟征收 25% 的关税，而欧盟不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逆差将会缩小（图 4 显示了以美元计算的相对基准预测的偏差）。但欧盟的报复将削弱这些影响。

图 4 对欧盟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将增加美国与欧洲的双边贸易差额，但报复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这些影响

a. Projected U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without retaliation, billions of dollars, 2024-40



b. Projected U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with retaliation, billions of dollars, 2024-40



Source: Warwick McKibbin, Megan Hogan, and Marcus Nol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PIIE Working Paper 24-20.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已承诺“对阻碍自由和公平贸易的不合理壁垒立即采取坚决回应，包括当关税被用来挑战合法且非歧视性政策时。”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假设欧盟将对美国商品增加 25% 的关税作为回应。但欧洲的报复可能不仅限于关税和商品贸易领域。服务、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政府采购都可能成为报复对象。

以迫使美国取消原有关税为目的的报复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如果美国让步，这种报复是可取的，但如果美国不让步，这种报复可能引发更多破坏性的保护主义措施。美国至今仍对轻型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与欧洲就冷冻鸡肉部位发生贸易争端的遗留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可以根据哪项法律（如果有的话）对欧盟全面征收关税。他已根据美国贸易法第 232 条，对钢铁、铝和下游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一条款赋予总统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不经国会批准而单方面征收关税的权力。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也引入了类似的关税，但当时盟友国获得了豁免。这一次不会有任何例外。

仅 232 条款关税一项就将增加美国经济中许多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尤其是那些大量使用钢铁和铝的产品和服务。美国的汽车生产成本将大幅上升，若机动车行业同样受到保护，消费者将转向欧洲和亚洲的车型。

特朗普政府还宣称，将根据所谓“互惠”政策，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关税范围。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将对其他国家征收与它们对美国征收的相同关税。这个词名义上强调公平，但美国的政策一点也不公平：它只是单方面提高

了美国的关税，并且包含允许美国逃避严格互惠的条款。欧盟的非歧视性增值税成为特别被针对的对象。更准确地说，这种做法是任意征收单边关税，完全不考虑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或自由贸易协定的义务。

仅就特朗普计划对欧盟征收 25% 的关税而言，除了直接的经济影响之外，这一错误政策将导致战后国际贸易架构的进一步瓦解，而该体系曾为美国和全球都带来福祉。鉴于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 PIIE 的一系列研究对额外贸易保护的警示，如果特朗普能忘记这一威胁，美国和世界都将会变得更好。

本文原题为 “Modeling a US-EU trade war: Tariffs won't improve US global trade balance”。本文于 2025 年 3 月刊于 PIIE 官网。本文作者 Warwick J. McKibbin 是 PIIE 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因其对全球经济模型（McKibbin Sachs 全球模型和 G-Cubed 多国模型的合著者）、货币政策理论、气候变化政策和流行病经济模型的贡献而享誉国际。Marcus Noland 是 PIIE 的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任，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交叉领域的广泛主题。[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刚“矿产换安全”协议为何事与愿违

Cullen S. Hendrix/文 赵元彬 / 编译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之间“矿产换安全”协议的潜在风险与挑战。研究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关键矿产（钴、铜、钽）的主要生产国，这些资源对美国的能源和国防技术很重要，但其长期处于政治动荡和内战状态，其复杂的种族冲突、系统性腐败和脆弱的基础设施使得美国难以获得稳定安全的矿产资源。美国应优先修复与稳定国家的矿产合作关系，而非通过军事援助手段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以获取矿产。编译如下：

2025年3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接触了特朗普政府并向其提出了一项高风险的提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公司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关键矿产储备领域，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虽然这样一项协议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它将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与过去在复杂和不稳定地区的纠葛相呼应。相反，美国应该专注于修复与加拿大这个关键矿产大国的关系，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进行接触。

出于经济韧性和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需要锂、铀和铜等关键矿产。它们是各种先进能源和国防技术所必要的投入品。美国渴望减少对中国这一全球关键矿产主要精炼国的依赖。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提议可能有助于美国实现矿产来源多样化。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利用其矿产财富促进增长和提供国内就业机会的努力，也可能降低该地区武装叛乱的吸引力。

然而，目前有关该提议公开的细节很少。据报道，作为给予美国公司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重要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独家使用权的回报，美国政府将以培训、设备和潜在的即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与的形式提供安全援助。据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初是通过一名代表刚果参议员的说客向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提出的。

1 价值主张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产资源既丰富又多样。该国是世界上钴的主要生产国，也是铜、钽、钻石和锡的重要生产国。除钻石外，其他矿产都被列入美国政府的关键矿产清单。钴是电池、喷气发动机和涡轮机的关键原料。钽是用于电容器、半导体和医疗植入物；锡则是用于焊料、化学品和能源领域。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还拥有大量的锂矿藏，尽管该国目前没有活跃的锂矿。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生产的大部分的钴和铜都在中国进行精炼和加工。

对美国来说，从源头获取矿产资源似乎更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特别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转向并专注于矿物加工，而不是启动国内采矿。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角度来看，争取与美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可以使其出口目的地多样化，并削弱中国目前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采矿业的影响力。

在 21 世纪，事实证明美国表现出比中国更强烈的直接干预其他国家实务的意愿，因此美国可以提供更具决定性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安全援助可以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稳定该国东部地区局势。然而，最重要的钴和铜矿床是位于相对稳定的卢阿拉巴省和上加丹加省，而安全挑战主要集中在北基伍和南基伍，两地相距大约 500 英里。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稀疏道路网并且其中仅有 2% 的道路铺设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很长的距离。

2 政治背景：复杂与暴力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世界上最穷和最不稳定国家之一。最近，在 2025 年 1 月，得到邻国卢旺达的支持，刚果反叛组织“3 月 23 日运动”（M23）控制了戈马，戈马是北基伍省的首府，也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最东部的主要城市。戈马的人口在 80 万至 200 万之间。由于戈马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地区一样，自 1984 年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官方人口普查，并且戈马是一个庞大和流动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社区的所在地，因此人口统计值的范围很广。

刚果民主共和国自 1993 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被称为扎伊尔，由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Désiré Mobutu）统治。蒙博托是美国支持的冷战时期的附庸，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在矿产丰富的东部地区煽动种族紧张局势来维持权力。随着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支持力度的下降，蒙博托在一个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州总和的国家统治着 4000 万人口，而该国的经济规模只有怀俄明州的一半。

1994 年邻国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很快陷入种族冲突。数百万胡图族难民——包括种族灭绝的参与者——逃往了该地区，而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掌权。1997 年，在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支持下，蒙博托被刚果叛军洛朗-德西雷·卡比拉驱逐。他的下台标志着第一次刚果战争（1996-1997）的结束，但战斗仍在继续。第二次刚果战争（1998-2003）爆发，安哥拉、乍得、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支持卡比拉政府，而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则支持反卡比拉部队，最后导致近 600 万人死亡。

时间向前推进十年。M23 运动成立于 2012 年，其前身是早期以图西族为主的刚果反叛团体“全国保卫人民大会（CNDP）”。这两个团体都得到了卢旺达政府的支持，而卢旺达政府被指控利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不稳定局势并协助武装团体掠夺该地区的矿产资源。长期的冲突和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童工和强迫劳动，是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中 3TG（锡、钨、钽和金）条款的幕后推手，该法案旨在阻止冲突矿产进入美国供应链。

如果这种情况听起来很复杂，那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五种官方语言，200 多种口语，以及多达 250 个不同的民族。尽管其自然地形挑战可能不及阿富汗干旱的山脉，但其复杂的人文环境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周边国家的干涉行为及中央政府机构的软弱无力，使得这一局面更加棘手。

这些挑战是中国能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资源施加影响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企业对在充满挑战、制度薄弱的环境中工作有更大的容忍度。在中方所有者掌控下，Kisanfu 矿山已成为重要的铜和钴生产商。此前，该矿权由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拥有。该公司于 2020 年将其出售给中国矿业公司 CMOC。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Freeport-McMoRan）出售 Kisanfu 是其剥离非洲业务和偿还债务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后者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而言约束力较弱。

3 巨大风险

作为一项确保获取安全矿产资源的战略，美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安全协议将伴随显著风险。最明显且后果最严重的是将美军卷入一场复杂的多党内战，就像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发生的那样。这两场冲突最终都使得美国陷入了泥潭，在美国付出大量鲜血和财富的代价之后，被迫在不太理想的条件下撤军。

其次，即使认为仅仅通过武力展示和威慑就可以改善安全局势，那里的商业环境仍将具有挑战性。从历史上看，美国矿工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矿工有充分的理由避开风险溢价较高、存在系统性腐败的市场：风险溢价增加了运营成本，而贿赂外国官员是非法的。特朗普政府最近暂停执行《反海外腐败法》180 天，这一暂停可能会延长，而且被认为是美国公司在某些市场竞争所必需的。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产能过剩和定价权，以及美国绿色能源转型的前景不明导致需求前景疲软，关键矿产的利润空间已变得极为微薄，这一挑战依然存在。

最后，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最丰富的矿产资源——钴，而美国对钴的需求前景并不明朗。如果《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被废除，美国未来对钴的需求可能会低于此前的预期。即便该法案未被废除，可再生能源存储和电池技术的变革也可能使钴在未来不像近期那样重要。钴基电池正在迅速被更便宜的磷酸铁锂（LFP）电池取代，而后者所需的材料更容易获得。

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样化对经济和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支持非洲努力利用其矿产财富促进可持续增长，并创造机会减少武装叛乱。但是，将美国的安全资源，包括人员，投入到地球上最不稳定的地方之一，将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实现手段。美国最好寻求其他选择。

本文原题为“Why a US-DRC minerals-for-security deal could backfire”，作者为 Cullen S. Hendrix。本文属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工作论文，发表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原文链接：<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5/why-us-drc-minerals-security-deal-could-backfire>。

芯片法案对美利益保障及废除对美投资环境之影响

Douglas A. Irwin / 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自通过以来，已成功吸引全球顶级半导体公司巨额投资，推动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迈向前沿，并显著增强国家安全。该法案通过慷慨的税收抵免等激励措施，克服了在美国建立和运营半导体制造的高成本障碍，引发了远超预期的投资激增。尽管面临关税等替代方案的挑战，但 CHIPS 法案在刺激投资、降低成本及提升竞争力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本文旨在深入分析 CHIPS 法案的成功要素、面临的挑战及改进方向，强调保留并优化该法案对于维护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编译如下：

在其最近向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声称，获得《芯片与科学法案》补贴的公司“拿了我们的钱却不花”，并敦促立法者“废除”该法案。（“CHIPS”代表“为半导体生产创造有益激励措施”）特朗普宣扬关税是吸引美国投资的更好工具，他援引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的例子，称在他威胁要对芯片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该公司最近承诺将其在美国的投资从 650 亿美元增加到 1650 亿美元。

然而，废除 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不仅会危及当前美国半导体投资的繁荣态势，还会阻碍政府为激励与中国竞争的投资而设计的任何未来计划。相反，特朗普政府若能提高该法案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效率，包括改革其超支的税收抵免政策，或许效果更佳。《芯片与科学法案》已吸引全球顶尖半导体企业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推动美国制造能力更接近前沿水平，并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即便剔除 2019 年之后的通胀因素，《芯片与科学法案》仍推动美国在 2019 年美元计价下获得逾 1100 亿美元的投资（见下图），这一数额超过了 2007 年至 2020 年（即《芯片与科学法案》前身获批之年）期间用于制造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设施的全部实际投资额。《芯片与科学法案》获两党支持而在国会通过，它源自首个特朗普政府任期最后几天通过的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2021）。

与基于关税的方法不同，《芯片与科学法案》刺激投资的同时，并未提高成本，因而不会削弱那些大量使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例如与中国在高风险竞争中角逐的人工智能公司。

倘若美国政府出尔反尔，收回此前承诺的激励措施，芯片制造商将会取消或缩减在美国的计划投资。如此一来，美国未来想要扶持的其他行业企业，就会质疑是否应基于美国政策进行投资，毕竟这些政策可能会被随意取消。

《芯片法案》补贴和税收抵免成功地刺激了美国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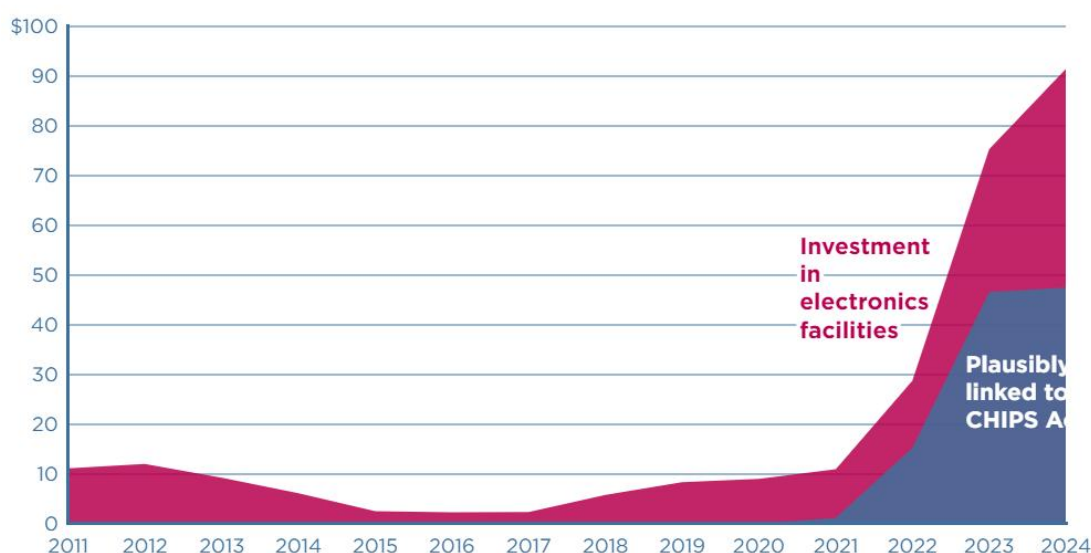
尽管美国在芯片供应链的诸多环节占据主导地位，但截至 2020 年，其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较小且呈缩减态势，且美国本土并无先进芯片生产。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吸引芯片生产回流至美国本土，可降低一旦台湾遭受入侵或封锁，全球几乎所有先进半导体制造业务被迫停摆的风险，同时有利于美国

国家安全，并有望为美国经济和科技创新带来积极溢出效应。《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为制造半导体或芯片制造设备的设施提供 25% 的丰厚税收抵免（见下图），促使众多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企业赴美生产芯片。原则上，任何投资芯片制造或设备制造的企业均可享受该税收抵免，且抵免金额无上限。尽管大多数关注点集中在 320 亿美元的定向拨款计划和 55 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上，但税收抵免最终将成为《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规模最大的补贴。其他关键计划包括劳动力培训援助以及研发（R&D）支持。全球范围内，具备所需技能的工人稀缺，若无这些工人，美国无法在本国生产芯片。这些计划还设有强有力的限制条件，以确保受助方不会同时在中国扩大芯片生产。

尽管在美国建造和运营半导体制造工厂的成本高于东亚地区，但图 1 显示，《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激励措施弥补了成本差异，引发了远超预期的投资热潮。

图一：半导体制造投资随着美国更多激励措施的出台而激增

US investment in construction of electronics facilities and amount likely linked to CHIPS Act, billions of December 2019 dollars, 2011-24



CHIPS = 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Source: Author's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Macrobond, and Clean Investment Monitor.

若将价格维持在 2019 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以避免将疫情后的通胀计入更高的投资额，计算结果显示，用于在美国建造生产电子产品、计算机和电气设备的设施的投资，从 2020 年之前十年平均每年略低于 70 亿美元，飙升至 2024 年的 900 多亿美元。目前，此类实际投资额持续稳定在每月约 75 亿美元左右。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已实现的建筑投资，而非未来可能削减的承诺投资。若不进行通胀调整，我估算《芯片与科学法案》已催生约 1580 亿美元的投资，2023 年和 2024 年平均每月投资额约为 57 亿美元。[1] 这一估算极为保守，因

为建造半导体制造工厂约一半的成本在于价值数亿美元的专用设备，而这些成本并未计入上述数据。

据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数据，包括未来支出在内的投资公告金额甚至更高，超过 5000 亿美元。除《芯片与科学法案》外，其他因素都不太可能引发如此巨大的投资增长，其他芯片生产国也未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对拨款资金的需求高于预期，美国政府芯片计划办公室（Chips Program Office）在拨款条件上获得了更大影响力，促使企业在制造更先进芯片方面进行更大规模投资，这使美国获得的收益甚至高于立法者的预期。

仅靠关税无法支撑芯片的发展

台积电承诺的 1650 亿美元投资看似比拜登政府谈判达成的成果更优，但这一投资是建立在《芯片与科学法案》成功基础之上的，并非仅由关税驱动。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称此次投资规模更大且无需额外拨款，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台积电预计仍会获得 25% 的税收抵免，若投资 1000 亿美元，补贴金额将达 250 亿美元，补贴率为 25%。这一补贴总额将高于拜登政府期间台积电此前 650 亿美元投资所获得的约 230 亿美元拨款及可能的税收抵免（补贴率为 35%）。台积电的这一承诺将使其在美国的晶圆厂更接近行业前沿，将先进封装业务布局在美国，这样一来，至少部分在亚利桑那州制造的芯片无需再运往亚洲即可集成到设备中，而且台积电还将首次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研发。

然而，台积电愿意以更低的补贴率增加投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芯片与科学法案》。就在几年前，投资风险要大得多，因为当时尚不清楚投资能否成功。当时美国没有先进的芯片生产，台积电也没有在台湾以外地区建设先进晶圆厂的经验。如今，台积电已经克服了工会、分区规划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成功生产出如今用于 iPhone 等产品的先进 4 纳米芯片，因此更有信心。在美国生产的芯片缺陷率这一决定生产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关键指标，与台湾生产的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优。若没有《芯片与科学法案》，台积电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经验。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苹果和英伟达等购买台积电产品最多的客户都位于美国。

尽管关税可能通过提高进口芯片成本来激励在美国的投资，但台积电进行投资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巩固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或者避免被推动与英特尔开展潜在合资经营。

关税也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对台湾半导体征收关税存在困难，因为大多数台湾半导体在境外完成测试、封装或集成到设备中后，才进口到美国，且不论哪种情况，它们都是以不同海关类别从不同国家进入美国。2023 年，台湾仅向美国出口了 82 亿美元的半导体，因此即便征收高额关税，也不足以支撑台积电

电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而且美国还需要（尚不存在的）庞大机构来追踪芯片并对其征收关税。

第二，建设半导体晶圆厂需要数年时间（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耗时四年），因此短期内实施的关税无法带来美国半导体供应的短期增长。相反，对半导体征收关税将在短期内导致所有含芯片产品的价格上涨，未来几年可能会带来增加本土生产的潜在好处。但企业可能会对此类投资持犹豫态度，因为额外的芯片供应大多会在特朗普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后才出现，而支持该投资的关税届时可能已不复存在。

美国政府应谨慎地从台积电的大动作中推断出，其他《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受助方也会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扩大在美国的投资。由于台积电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财务状况极为强劲，堪称独一无二。例如，三星的代工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如果没有补贴，很难证明在美国这样成本高昂的司法管辖区进行大规模投资是合理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和梅根·霍根（Megan Hogan）对《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分析发现，获得拨款的投资项目中，按价值计算超过80%的项目如果没有拨款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而这些投资支撑了4万多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些较小的项目可能在没有《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或贷款的情况下也会进行，但“对于较大的项目而言，《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拨款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改善芯片法案

《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拨款和贷款仅授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最有可能有助于提升美国安全保障和制造业实力的项目，且这些拨款和贷款受到严格的预算约束。如果投资按当前水平持续到2026年，仅税收抵免的成本就可能超过730亿美元，远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最初估计的242.5亿美元。相比之下，该税收抵免对美国境内任何半导体制造项目均开放，且没有任何上限。

为控制成本同时避免干扰已开展的投资，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针对尚未动工或扩大规模的项目，制定更为严格的税收抵免资格要求。可以修订相关立法，纳入此类规则，或者授权《芯片与科学法案》项目办公室将资格审核与成本效益分析挂钩，类似于当前用于拨款申请的分析方式。此类审查将确保申请税收抵免的项目物有所值，并有助于发现任何试图非法获取税收抵免的企业。为落实这一点，美国政府需要保留《芯片与科学法案》项目办公室在政府内部积累的专业知识，以确保政府能够核实企业是否履行了其承诺。

《芯片与科学法案》也可加以调整，使其更聚焦于其既定目标，移除诸如儿童保育要求等条款，这些条款因试图实现与半导体无关的进步优先事项而受到批评。

结论：持续推进《芯片与科学法案》

《芯片与科学法案》成效超出预期，无论从法案本身来看，还是从向投资者释放美国在其于美投资建厂时会履行承诺的信号来看，该法案都值得保留。台积电最近承诺增加投资，这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威胁。关税需多年才能提振国内生产，且可能不会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与此同时，关税会使使用芯片的美国消费者、企业以及政府机构在购买手机、笔记本电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产品时花费更多。为提高成本效益而做出谨慎调整可能具有意义，但若撤销对依赖《芯片与科学法案》的现有项目的支持，将会损害美国在根据美国政府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投资者的信誉。这不利于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行业进行未来投资，冒此风险并不值得。

本文原题为“The CHIPS Act already puts America first. Scrapping it would poison the well for US investment.”。本文作者 Martin Chorzempa 自 2021 年 1 月起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25 年 3 月刊于 PIIE。[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并非所有的房地产周期都是相同的：房地产暴涨的宏观经济后果

Bruno Albuquerque, Eugenio Cerutti, Yosuke Kido, Richard Varghese 文/刘铮 编译

导读：本文用了 68 个国家 1970 年到 2023 年的数据集证明，尽管房地产扩张可以短期促进经济增长，但平均而言暴涨式的扩张会导致中期经济增长下降。放松土地使用规定和培育鼓励住房建设的商业环境有助于缓解住房市场低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编译如下：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下面问题的兴趣——即我们是否能够区分“好的”房地产扩张（不会带来宏观金融稳定风险）和“坏的”房地产扩张（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持久损害）。本文用了 68 个国家 1970 年到 2023 年的数据集证明，尽管扩张可以支持增长，但暴涨式的扩张（房价飙升远高于特定国家的正常范围）平均而言会导致中期经济增长下降。

越来越多的研究考察了房地产暴涨-萧条周期，强调了房地产市场动态如何增加金融稳定风险，以及房地产调整如何留下长期经济创伤（Claessens 等，2009 年；Mian 等，2013 年；Mian 和 Sufi，2014 年；Cerutti 等，2017 年）。经验证据表明，如果之前发生过快速的信贷扩张（即所谓的信贷繁荣），则随后的房价调整尤其具有破坏性。（Claessens 等，2009 年；Jordà 等，2015 年；Dell Ariccia 等，2016 年；Cerutti 等，2017 年；Albuquerque 和 Krustev，2018 年）。

在一篇新论文（Albuquerque 等 2025a）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 68 个国家从 1970 年第一季度到 2023 年第四季度数据的长期全球宏观金融数据集，包括 35 个发达经济体（AES）和 33 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以记录世界各地的房地产周期。具体来说，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框架来划分房地产市场的不同阶段——收缩和扩张（我们将扩张分为非暴涨扩张和暴涨式扩张）。

我们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当房地产市场收缩是紧随房地产市场暴涨（其特点是房价快速而持续地上涨）之后发生时，经济衰退往往会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虽然房地产暴涨在扩张期间提振了房价、GDP 增长和消费，但其对整个周期的净影响是负面的。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驱动的衰退导致经济急剧收缩，偏离了非暴涨时期的稳定增长。

令人欣慰的是，房地产暴涨-萧条周期可能并非不可避免。住房供应弹性较大的国家，在房地产收缩之后，经济下滑往往较为温和。这意味着，放松土地使用规定和培育鼓励住房建设的商业环境有助于缓解住房市场低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此外，基于借款者的措施也可以降低房地产暴涨后出现严重经济收缩的风险。

并非所有的房地产周期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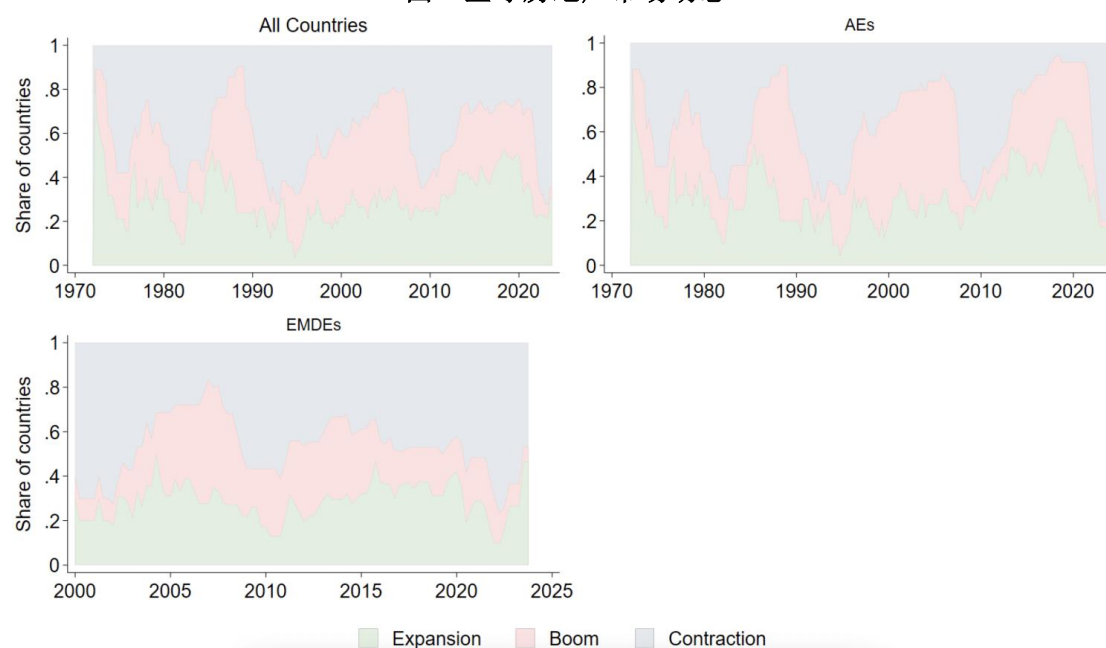
我们使用 Harding 和 Pagan（2002）的 BBQ 算法来识别住房周期（“扩张”和“收缩”）以检测转折点，并对参数进行校准以捕捉相对较长的金融周期。此外，根据 Cerutti 等 2017 年的研究，在扩张阶段，我们将房地产暴涨定义为一段时期内房价持续、快速增长超过特定国家的阈值。当满足两个条件时，住房市场被归类为房地产暴涨：

强度：在一个季度中，实际房价同比增长必须超过 5% 或特定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加两个标准差。

持续性：增长率必须至少连续六个季度保持在 5% 以上或超过特定国家的平均水平加一个标准差。

通过结合房地产周期和暴涨，我们记录了关键的房地产市场动态（图 1）。我们识别到了 180 个房地产扩张阶段，其中 49% 为房地产暴涨。在全球金融危机（GFC）之前，超过 40% 的国家经历了房地产暴涨，但在此之后，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在后疫情时代，许多发达经济体在同步收缩之前，经历了新一轮的房地产暴涨。

图 1 全球房地产市场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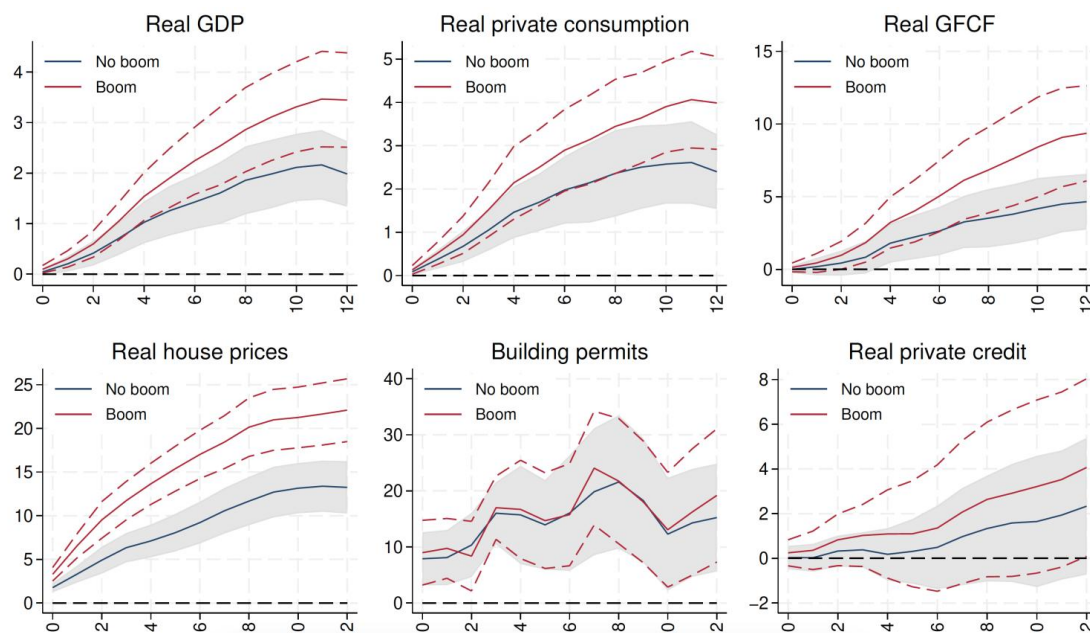
注：根据 BBQ 和暴涨算法，上图显示了各国在房地产市场不同阶段所占的份额。

房地产周期中可预测的经济模式

利用本地预测，我们分析了房地产扩张期间实体经济的轨迹，区分了非暴涨期和暴涨期。我们发现，相对于非暴涨时期的房地产扩张，房地产暴涨推动了 GDP 和私人消费增长（图 2）。按照设计，在暴涨时期，实际房价上涨幅度更大，12 个季度后上涨约 8 个百分点，但以建筑许可衡量的住房供应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房地产暴涨推动了价格飙升，而不是供应增加。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也没有发现房地产暴涨期间房价的更快增长转化为更高的家庭可支配收入、

就业增长或住宅投资。这些发现表明了房地产暴涨的潜在负面溢出效应，主要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当，这与美国和中国的证据一致，表明房地产暴涨会对非金融企业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Chakraborty 等，2018 年；郝和欧阳，202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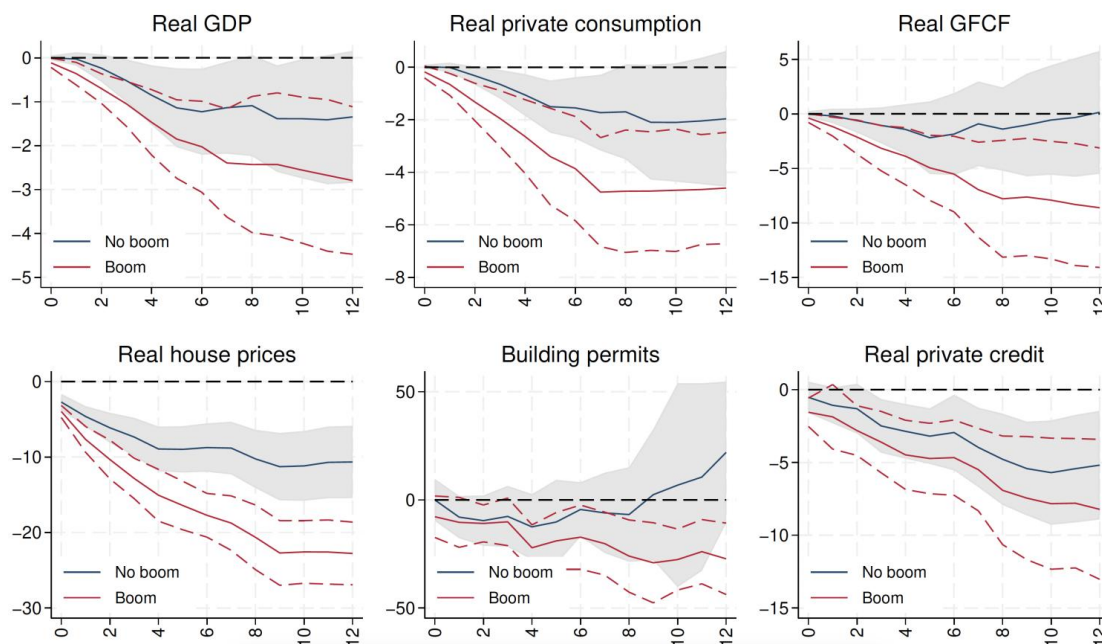
图 2 房地产暴涨与非暴涨式扩张



注：在房地产非暴涨扩张（蓝线和灰色区域）和暴涨（红线）期间，所选变量在 12 个季度内的累积脉冲响应。灰色区域和红色虚线表示各自的 90%置信带。标准误差按国家和时间进行双重聚类。

当关注房地产市场收缩时，我们发现，当之前发生过房地产暴涨时，经济衰退明显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图 3）。在收缩期间，GDP、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幅度更大，房价和住房供应（建筑许可）的下降也更加明显。然而，我们在私人信贷中发现了类似的统计反应。与非暴涨扩张不同，后暴涨时期的房地产供应收缩与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房地产供应弹性的下降使房价而不是数量成为房地产周期的主要驱动力，从而放大了经济不稳定性（Aastveit 等，2020 年；Albuquerque 等，2020，2025b）。这一模式也反映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加深经济衰退的作用（Mian 等，2013 年；Mian 和 Sufi 等，2014 年）。

图 3 房地产扩张高峰后所选变量的条件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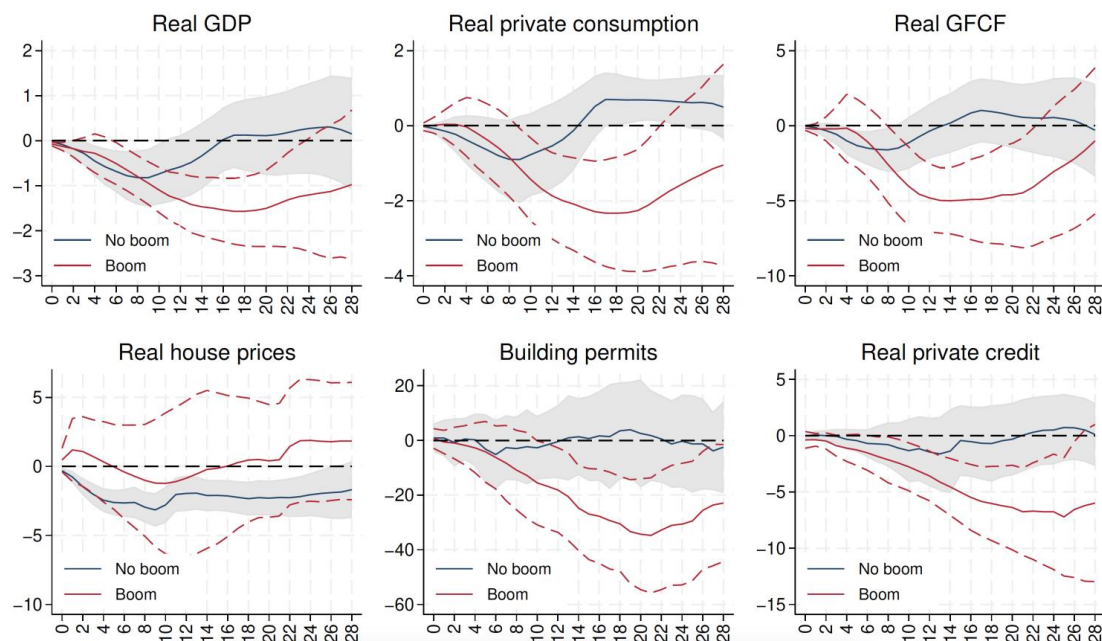
注：所选变量在 12 个季度内的累积脉冲响应在与房地产暴涨一致的房地产扩张峰值（红线）与不与房地产暴涨一致的扩张峰值（蓝线和灰色区域）之间。灰色区域和红色虚线表示各自的 90%置信带。标准误差按国家和时间进行双重聚类。

我们的分析表明，前期是否存在暴涨以及暴涨的强度决定了房地产收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强劲的暴涨（以累计房价增长衡量）一旦结束，经济复苏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非线性效应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似乎是信贷动态。我们确认，当房地产暴涨与家庭信贷繁荣同时出现时，经济衰退甚至更加严重。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确认了家庭资产负债表和资源配置不当在推动房地产暴涨-萧条周期后的长期经济创伤中的重要性，这与关于衰退的长期影响的文献一致（Blanchard 等，2015 年；Cerra 等，2023 年）。

房地产扩张的净效应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房地产暴涨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虽然房地产扩张可以支持增长，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伴随着暴涨的扩张——房价飙升远高于特定国家的正常水平——平均而言会导致中期经济增长下降（图 4）。暴涨过后，经济活动急剧下降，偏离了非暴涨期的典型增长。重要的是，并非所有房价相对于收入的长期上涨都预示着未来增长的减弱。

图 4 住房创新后所选变量的条件模式：房地产暴涨与房地产非暴涨扩张



注：对于房地产非暴涨扩张（蓝线和灰色区域）和暴涨（红线），用 12 个季度的 HPI 变化来衡量，在住房创新增加一个标准差后，所选变量在 28 个季度内的累积脉冲响应。灰色区域和红色虚线表示各自的 90% 置信带。标准误差按国家和时间进行双重聚类。

减轻房地产收缩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关键杠杆来减轻与房地产收缩相关的经济痛苦（Albuquerque 等，2025a）。首先，放松土地使用规定，培育鼓励房地产建设的商业环境，有助于缓解经济低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例如，收紧以借款人为基础的措施，包括限制贷款价值比（LTV）或偿债收入比（DSTI）——可以降低房地产暴涨后出现严重经济收缩的可能性。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传导渠道，并确定实施这些政策的最佳时机。

本文原题为 “Not all housing cycles are created equal: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ousing booms”。本文作者 Bruno Albuquerque 是 IMF 高级经济学家，Eugenio Cerutti 是 IMF 宏观金融部门主管，Yosuke Kido 是 IMF 经济学家，Richard Varghese 是 IMF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25 年 3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移民和政治重组

Javad Shamsi/文 赵元彬 / 编译

导读：本文分析了 2004 年欧盟扩大后移民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基于行业移民流动与地区就业结构构建暴露指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移民暴露地区对右翼反移民政党（如 UKIP）和脱欧支持显著上升，对工党支持下降；选民态度趋保守，政治话语中移民议题负面讨论增加，保守党在受冲击选区更关注移民。移民冲击推动政治冲突从经济再分配转向文化认同分歧，选民联盟沿文化维度重组，在移民影响强烈地区尤为明显。研究发现，移民通过提升文化议题显著性促使英国政治从阶级分化转向身份驱动，为理解民粹主义及脱欧提供了全新视角，警示了文化分裂对政策的潜在影响。编译如下：

1 引言

在许多国家移民已成为一个争议性问题。那么，这对于选举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近期研究表明，移民有利于右翼（有时甚至是极右翼）政党的选举前景（Tabellini, 2020；Dustman 等, 2019；Halla 等, 2017）。然而，右翼政党（而非其左翼对手）却发表反移民言论，令人困惑。移民在就业竞争和潜在工资抑制方面主要影响的是非熟练劳动力群体——而这一群体传统上倾向于左翼意识形态。左翼政党以经济再分配为核心议题，本应更自然地获得这种经济不安情绪下的支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恰恰是那些主张低再分配议程的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掌握了这一叙事话语权。

在本文中，我深入研究了英国背景下的这些动态，重点关注来自欧盟（EU）新成员国的移民。我展示了移民的突然涌入改变了人们对反移民立场的态度，并使选民倾向于支持右翼反移民政党。在政治的供给端，也出现了类似的反移民言论，因为各政党在应对移民问题时采取了更多的地方主义反移民言论。我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是，移民的突然涌入提高了移民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并使这一问题和更广泛的文化问题成为政治争论的主要焦点。我通过实证表明，在应对移民问题时，非经济维度会成为投票和群体聚集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移民冲击之后，工人阶级选民可能会背离使他们经济福祉最大化的左翼政党，而倾向于与他们的国家和文化认同产生共鸣的民族主义政党。

我的研究设计将 2004 年欧盟扩大视作一个自然实验。2004 年，10 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我的识别策略基于来自欧盟准入国家的移民在不同行业中的分布特征，将其作为比较优势的代理变量，分析英国各地区因预先确定的行业专业化而产生的差异化移民暴露程度。这项研究设计近似于一个理想实验，即在不同地区随机分配不同数量的移民。为进一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利用 2004 年前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增长情况，作为从新成员国到英国各行业中移民增长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受到 Autor 等（2013）论文中观点的启发，使我能够分离出供给驱动的移民暴露变化，并研究其对投票的影响。

这一方法所依据的排除限制假定，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在行业内共同增长的现象，源于这些国家工人在不同行业和职业中的相对技

能差异。这一假设认为，那些在 2004 年前欧盟国家移民吸引力较高的产业聚集地区，与其他英国地区在不可观测特征上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本研究采用滞后因变量进行多组证伪检验。在各类模型设定下，结果始终支持该假设。

基于这一测度方法，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展示了移民暴露程度更高的人倾向于更多地投票给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党。我着重分析了持强烈欧洲怀疑论的英国独立党（UKIP）的选举结果，这直接反映了当地人对反移民政策的要求。通过使用总体和个人层面的数据，本文证实：在受到移民严重影响的地区，UKIP 在常规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均获得显著支持。然后进一步研究表明移民冲击使公众态度转向更加反移民和社会保守化。类似模式在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同样显现：受移民影响较大的地区明显倾向于支持英国脱欧，这一趋势在总体和个人层面数据的双重验证下均表现出强稳健性。反事实分析表明，若排除移民因素，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将发生逆转。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对移民冲击的回应，选民在态度上变得更加反移民，其投票行为也日益脱离传统的左右翼阶级维度。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证据表明政治供给端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向。通过采用多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本文证实英国政党在政治演讲中愈发强调移民议题，且通常为负面基调。为了阐明文化价值观更广泛的潜在转变，我使用 Enke（2020）的测量框架，观测政治修辞的文化极化现象。根据这一标准分析，近年来保守党的演讲愈发淡化普世主义基调，而工党的演讲则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

最终，本文论证了上述所有研究结果均可归因于选民联盟的转变——作为对移民冲击的回应，其决策基准正从传统经济考量转向文化价值维度。研究表明，虽然英国在再分配政策上的分歧呈下降趋势，但围绕文化政策（特别是移民议题）的分歧却有所加剧。聚类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公共话语的这一转变，揭示了整个研究周期中选民群体从经济到文化维度的系统性重组。可以看到在受移民冲击最严重的地区，这种文化层面的聚集更为强烈。

从阶级政治向身份/文化政治的转变，有可能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忽视对再分配政策与福利国家体系的批判性关注。随着身份驱动型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决策者可能会发现，当旨在提升经济效率或促进公平的政策与主流身份政治话语相悖时，政策制定者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实施阻力。这一转变会加剧在移民、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等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催生极端政策立场。这些条件是民粹主义崛起的肥沃土壤，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利用身份问题来争取支持，而这种策略往往以牺牲精细化经济战略设计为代价。

本研究建立在多个学术脉络基础上，并将其整合在一起。本文为关于移民对选举的影响的文献做出了贡献，该领域文献主要认为移民增长会提升右翼政

党支持率。例如，Tabellini（2020）发现，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移民潮给东道国社区带来了经济收益，但同时强化了保守派政客和反移民政策的支持基础。类似结论在奥地利（Halla 等，2017）、意大利（Barone 等，2016）、西班牙（Mendez 和 Cutillas，2014）及德国（Otto 和 Steinhardt，2014）等国的实证研究中均得到验证。该领域文献中主导性方法论为“迁移-份额”实证设计，它将各地区的历史定居模式与同期的国家移民潮相结合。这一方法整合了各地区历史定居模式与同期全国移民流量，旨在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即潜在移民倾向于规避感知不友好区域）与遗漏变量偏差（即混杂因素可能共同形塑移民模式、经济动态与政治态度）两大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在移民政治效应研究领域做出多重贡献。方法论层面，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基于各地区产业结构和跨产业移民比较优势的准实验性“迁移-份额”设计，并进一步以欧盟其他国家的行业特异性移民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这一方法利用了以前未探索过的移民风险的新变化，并解决了依赖于历史定居模式的传统转移份额工具的一些局限性。有证据表明，东欧移民在英国的历史分布并不能有力地预测后来移民的流入，因此，基于先前定居点的传统转移份额工具尤其不适合研究东欧移民到英国的情况。这项研究还将其范围扩大到研究政治的供给方面，在一个相对未知的研究领域，即次国家层面，分析对移民的政治反应。最后，本文提供了选民在文化维度上重新组合的证据，深入分析了移民加剧反移民情绪并随后支持右翼派别的机制。它还回答了为什么反移民情绪主要转化为对右翼政党而不是左倾政党的支持。

上述文献中的一部分关注研究移民在英国背景下的影响，特别是与英国脱欧公投有关的影响（Becker 等，2016、2017；Colantone 和 Stanig，2018）。值得注意的是，Becker 等（2017）、Colantone 和 Stanig（2018）的研究发现欧盟移民与英国脱欧公投中的“留欧派”支持率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然而，这项研究揭示这一结论源于未充分考虑移民区位选择的内生性问题。通过隔离外生性移民冲击，可明显观察到移民对投票行为的实质影响。该研究结果与 Becker 等（2016）和 Viskanic（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观察到随着东欧移民的涌入，UKIP 的得票率有所增加。与这些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创新性地采用了基于新型迁移-份额工具变量的移民暴露测量框架，并对这些选举动态背后的潜在机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本研究关联到最近一个关注身份认同在经济学中作用的新研究方向。这些文献承认个体具有多重身份，并探讨如何根据经济因素对这些身份进行优先排序。Shayo（2009）将身份选择建模为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成本之间的平衡，指出社会的身份形成和经济条件是相互关联的。Grossman 和 Helpman（2021）将此应用于贸易政策，展示了经济变化如何改变自我认同并影响保护主义倾向。Bonomi 等（2021）引入了多个政治维度（经济左派对经济右派，文化自由派对

保守派），指出由经济冲击形成的问题显著性可以改变社会身份并影响政治立场，从而将传统的左翼右翼分歧转变为自由派保守派分歧。Besley 和 Persson（2019）探讨了选民的信仰和政党归属如何随着经济变化和非经济因素（如移民）的凸显而演变，强调了经济状况、社会身份和政治格局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本文的实证结果与这些文献中的几篇理论论文相一致并对其进行了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Gennaioli 和 Tabellini（2023）的研究，当社会保守派选民（通常技能较低）更多地暴露于移民环境中，或者当移民问题的重要性增加时，选民更有可能与他们的文化身份而非经济阶级的立场保持一致。本文的中心主题通过提供移民可以影响政党支持和重塑政治分歧的实证证据补充了这些理论，强调了文化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以至于压倒了传统上对基于阶级的政治的重视。这一发现与 Danieli 等（2022）在该领域的一项缺乏实证研究相一致，它强调了人们的优先事项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经济转向文化问题的。

最后，本文立足政治经济学和计算语言学的交叉领域，为利用文本数据解析复杂社会政治现象的新兴文献做出了贡献（Wilkerson and Casas, 2017; Gentzkow 等, 2019）。这项研究是开创性的努力之一，与 Bhatiya（2023）等少数几个人一起，应用文本分析来考察对选区层面冲击的政治反应程度。我采用了一系列文本指标来评估立法者对移民问题的参与，并结合了 Enke（2020）设计的方法来量化立法者言论中的普世价值。

本文后续章节的结构如下：第 2 节概述了研究的数据和背景。第 3 节介绍了移民暴露度的衡量方法，并描述了实证方法。第 4 节从总体和个人层面研究了移民对态度和投票模式的影响。第 5 节审视了政治供给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评估对移民潮的政治反应。在第 6 节中提出了证据支持这一论点，即移民冲击促使选民从传统的基于阶级的区别转向考虑文化身份。最后，第 7 节讨论其相关影响并作出了总结性评论。

2 设定和数据

在本节中，我通过讨论欧盟和英国移民的背景和政治环境为研究提供背景信息。具体而言，我考察了 2004 年和 2007 年的欧盟扩大和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涌入英国的情况，以及这些事件的政治表现。然后，我描述了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来源和变量。

2.1 背景。

欧盟（EU）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1957 年由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签署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启动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这是一个将劳动力自由流动纳入其框架的关税同盟。这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欧盟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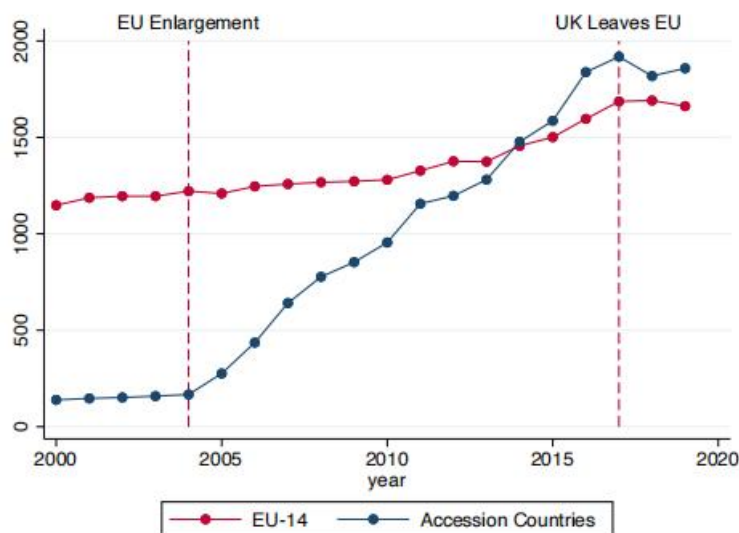
英国最初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CC）犹豫不决，但后来在 1963 年和 1967 年分别两次提出申请，均被法国否决。英国最终于 1973 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5 年，由于工党承诺重新评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资格，并就这些新条款征询公众意见，英国举行了全民公投。公众被问及英国是否应该留在欧洲共同体。34.5% 的肯定回答确认了英国在修订后条件下的成员资格。

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推动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 1986 年建立单一市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倡导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992 年，欧共体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转变为欧洲联盟。英国对进一步深化政治一体化持谨慎态度，选择不加入欧元货币和申根区。

2004 年 5 月 1 日，包括 8 个东欧国家以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内的 10 个国家加入欧盟，使欧盟人口增加了近 7500 万。这是欧盟自 1973 年英国加入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加入欧盟，使欧盟人口增加了 3000 万。在这些新成员国（以下简称为“NMS”）加入欧盟后，英国的 Tony Blair 政府是少数几个没有对来自这些新成员国的移民实施临时限制的成员国之一。

证据表明，从这些国家来到英国的实际移民人数远远高于英国政府的预期。图 1 使用年度人口调查（APS）的数据，展示了按国籍划分的移民数量随时间的变化。如图所示，在 2004 年之前，大多数来自欧盟的移民来自 2004 年之前加入欧盟的“EU-14”国家。然而，在 2004 年之后，来自 NMS 的移民数量显著增加。NMS 出生的英国居民人口增加了 10 倍以上，从 2004 年估计的 160,000 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85 万人。相比之下，来自 EU-14 国家的移民数量增长则较为缓慢。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后，来自 NMS 的移民数量开始下降。这些特征表明，欧盟的扩大对涌入英国的移民造成了突然的重大冲击。

图 1



注：本图表显示了英国的欧盟出生移民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按国籍和出生国家划分的人口数据。英国居民的估计人口按出生国家分类，不包括居住在集体住所（如招待所或护理院）的人群。估计数据基于年度人口调查（Annual Population Survey, APS），包括劳动力调查（Labour Force Survey, LFS）的第一轮和第五轮，以及年度样本扩充。样本扩充主要旨在改善地理覆盖范围。对于 2004 年之前与新成员国相关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季度劳动力调查，因为原始数据集不包含这些信息。新成员国是指 2004 年加入欧盟的国家。

这一新移民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新移民在英国境内的空间分布也与 2004 年之前进入英国的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的地理分布也有所不同。这一点在图 A.1 中很明显，它显示了 NMS 移民在每个地方当局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独有的特征促使我将 2004 年和 2007 年的欧盟扩大作为一个自然的准实验进行实证分析。

随着欧盟影响力的扩大，英国国内对进一步一体化的反对声音随之增强。这种反对在 UKIP 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该党最初于 1991 年以反联邦主义者联盟的名义成立，1993 年更名为现名，将其纲领扩展为涵盖更广泛的右翼议程，其主要目标是让英国退出欧盟。尽管由于英国议会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度，UKIP 在英国议会中难以获得席位，但他们在欧洲议会（EP）选举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一成功可以归功于两个主要因素：在欧洲选举中实施比例代表制，以及欧洲选举倾向于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欧盟特有的问题上。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UKIP 以 26.2% 的得票率获胜。

UKIP 在英国的崛起反映了在其他几个西方国家观察到的更广泛的趋势，体现了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疑欧情绪。这一现象的特点是对欧盟等超国家机构所代表的全球化的怀疑，对国家主权的担忧，以及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类似的运动在法国的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AFD）、意大利的联盟党（Lega Nord）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等国家都获得了支持，特朗普利用了反移民和反建制的言论。这些政党和领导人通常会将公众对经济混乱的挫折感、文化身份的丧失感以及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情绪引导出来。

在 2015 年大选之前，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为了安抚党内的疑欧派并应对 UKIP 的威胁，做出了一项战略承诺，即如果保守党能够赢得多数席位，他将重新谈判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条款，并举行一次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试图重新团结他的政党，并保留原本可能投给英国独立党的选票。他是在预测显示最有可能出现悬浮议会的情况下做出这一承诺的。然而与普遍的预期相反，保守党赢得了绝对多数。这一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迫使卡梅伦坚持他的公投承诺，最终导致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

在整个脱欧公投运动中，移民问题成为一个关键和具有分歧性的问题，尤其被脱欧运动和英国独立党强调。许多英国脱欧支持者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移民数量上升的担忧，将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说成是英国对边境管控权的丧失。他们主张英国应该重新获得对谁能够进入本国的控制权，并采用“澳大利亚式的积分制”，平等对待欧盟和非欧盟移民。如图 A.4 所示，在选举之前，公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显著增加，甚至超过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此外，工党和保守党选民之间的担忧差距也大幅扩大，这是自 2001 年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当时移民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民调数据还显示，脱欧投票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希望重新获得对移民和边境的控制权，根据 Ashcroft（2016）在选举日对 12369 名选民进行的调查，33% 的脱欧选民表示这是他们的主要动机。最终，经过为期 10 周的激烈竞选，英国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以 52% 对 48% 的投票结果退出欧盟。

虽然英国脱欧已经是对移民问题担忧的高潮，但随着 NMS 移民人数的增加，这种模式似乎开始加剧。如图 2 所示，这一加剧趋势通过三个相互交织的指标得到体现——公众舆论、媒体代表和议会焦点——他们共同说明了移民如何成为英国的关键问题，并最终在英国脱欧公投前达到顶峰。如顶部面板所示，公众舆论反映出民众日益认为移民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中部面板对媒体报道的描述呼应了这种情绪，揭示了移民在英国最广泛阅读的报纸中出现频率的平行增长。底部面板显示的议会焦点表明，移民问题不仅是公众和媒体关注的问题，也是立法讨论的重要议题，下议院对移民的提及与其他指标一起激增。这些指标的时间线提供了一个暗示性的叙述：随着 NMS 移民数量的增长，移民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也在增加，这一趋势随着英国脱欧的决定达到了临界点。

与脱欧运动对移民的关注及其在整个竞选活动中的突出表现相反，数据表明，外国出生居民比例较高的地区更倾向于投票英国留在欧盟（Becker 等，2017；Colantone 和 Stanig，2018）。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是，移民往往倾向于流向文化更包容、经济更强劲的地区，例如伦敦，该地区吸纳了很大一部分来自 NMS 的净移民，并主要投票支持留欧。随后的章节将深入探讨移民与反移民情绪上升之间的因果关系。

2.2 数据源

地方当局或选区的就业构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ONS）的企业注册和就业调查（BRES）。BRES 是一项年度商业调查，提供详细的地理和行业层面的雇员和就业估计。它是英国按详细地理和行业划分的雇员和就业估计的官方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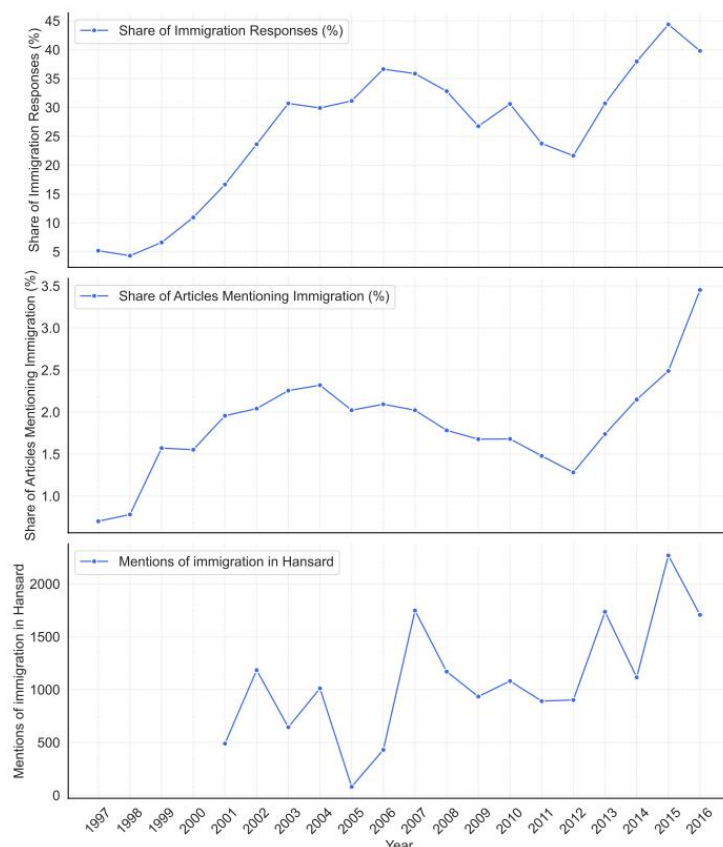
为了根据工人工作的公司类型对工人进行分类，我使用了两位数的标准行业分类（SIC）。全国范围内 NMS 的移民人数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季度

调查“劳动力调查”（LFS），该调查提供了有关英国人口就业状况和特征的信息。劳动力调查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抽样调查，广泛用于编制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官方统计数据。

我利用欧盟劳动力调查（EU-LFS）的数据，估计了 2004-2016 年期间每个行业从 NMS 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年度双边总移民流量。欧盟劳动力调查是欧盟统计局进行的一项大型家庭抽样调查，旨在提供 35 个参与国/地区 15 岁及以上人口以及劳动力以外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的季度结果。这是欧洲同类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项，被广泛用于生成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官方统计数据。

为了研究反移民情绪，我运用了英国选举研究（BES）的个人层面数据，特别关注于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2 日期间进行的第 8 波研究，该研究是在 6 月 23 日英国脱欧公投之前进行的。这一波研究包含了 31,409 名参与者的样本回答。它不仅捕捉了公投中的投票意向，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数据集，其中包括对移民的态度等变量。为了在分析中增加一个地理维度，我根据每个受访者的居住地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将他们分配到相应的地方当局。

图 2



注：顶部面板量化了公众舆论，显示每年将移民视为英国三大关键问题之一的受访者百分比（数据来源：Ipsos Mori）。中部面板考察了媒体呈现，展示了在这一时期英国发行量最高的三家报纸——《太阳报》《每日镜报》和《每日邮报》中提到移民的文章的加权比例。底部面板提供了议会视角，展示了下议院议员在 Hansard 记录中提及移民的频率。

对于个人层面的投票分析，我使用了英国社会纵向研究的数据。“社会纵向研究”是一项针对英国家庭的小组调查，收集与社会、经济和健康问题相关的广泛主题的数据。这项研究由埃塞克斯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所（ISER）进行，始于2009年，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数据收集。社会纵向研究以英国家庭跟踪调查（BHPS）为基础，BHPS是1991年至2009年进行的一项类似跟踪调查。社会纵向研究由约40,000个家庭组成，约有80,000人参与。该调查包括人口统计、就业、教育、健康和其他主题的详细信息，以及包括与移民有关的态度和信念的衡量标准。

为了考察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定位的演变，我使用了教堂山专家调查（CHES）的数据。CHES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欧洲研究中心（CES）主导的一项持续性计划。它系统地收集了专家对欧洲各种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态度的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使用CHES数据来分析政党在经济和文化议题上的立场变化。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议员们在移民问题和社会价值观上的立场，我从官方网站（<https://hansard.parliament.uk>）上获取了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这些记录是在开放议会许可下发布的，便于在适当注明来源的情况下用于研究。通过分析这些辩论中使用的语言和语气，我可以更好地理解政党的文化观点，尤其是移民问题，以及它们可能因移民问题而发生的变化。

7 结论

在许多西方国家，移民的日益普遍和政治分裂与这些国家政治格局的关键转变相吻合。二十世纪的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分歧决定的——左翼主张工人权益和社会福利，而右翼则支持小政府和私营部门主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政治更侧重于身份和文化问题的博弈，左翼支持各种边缘化群体，而右翼则专注于保护与种族、民族或宗教相关联的传统民族认同。这种时间上的重叠引发出一个问题：移民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或影响了这一深刻的政治演变？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首先分析了本地移民接触程度如何影响社会态度和政策偏好，结果显示人们对移民的反感情绪日益增长。这项研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研究设计，结合行业间的移民流动和地区就业结构的变化，挖掘了以往从未被探究过的移民接触程度差异。我使用类似于英国的其他移民目的地（即2004年前的欧盟国家）的特定行业移民流向作为工具变量。这种方法揭示了移民冲击会引发政治支持的显著转变，具体表现为个人从传统的左倾工党转向右翼、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UKIP）。此外，本研究还延伸到政治言论领域，突出表明受移民严重冲击的选区的议员倾向于在议会演讲中消极对待移民问题，或采取更加本地化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工党议员明显没有这样的反应，这凸显了对移民的动态反应具有复杂性和政党特性。

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看，我提供的有力证据可以解释由移民驱动从经济因素到文化因素的选民重组。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在选民、政治话语和媒体叙事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移民相关话题的日益突出与围绕文化问题的分歧加剧同时发生，文化因素作为影响选举选择的关键力量登上了中心舞台。此外，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倾向于因移民而沿文化维度重新聚集，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考量主导的政治格局。

然而，这种分析并非没有局限性。关于移民在选民重组中作用的启示性证据，虽然很有启发性，但也表明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建立更有力的因果联系，并全面把握这一转变的程度。认识到这些局限性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可以探究其他可能同样影响政治格局的潜在冲击（如经济衰退、技术变革、全球化和环境危机）。探索这些领域可以增强我们对政治和社会动态的把握，为制定具有响应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提供信息。

这些发现对我们看待近年来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中考虑到这些动态的政治分歧。忽视这一演变可能导致对选举结果的误读、政策与公众需求脱节、选民不满情绪增加，甚至可能助长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崛起。

总之，本文提供了实证见解，补充了现有的理论框架，强调了诸如移民等冲击对选民从经济考量向文化考量重新调整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移民如何重塑英国的政治格局，强调了面对不断演变的文化动态时，需要对当代政治有更复杂和多方面的理解。

本文原题为“Immigration and political realignment”，作者为 Javad Shamsi。本文属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表现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讨论论文系列，可通过 LSE 官方研究存储库或中心官网获取。

贸易与国内冲突

Hoda Assem /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这篇论文研究了内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它量化了内战对贸易的抑制作用，并通过结构引力模型探讨了背后的机制。一方面，贸易开放可能通过威慑机制降低内战风险，因为国际贸易带来的预期收益会阻止冲突；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可能通过保险机制降低内战的机会成本。论文还研究了内战对未卷入冲突的邻国贸易的溢出效应，发现这种溢出效应极为不利。此外，论文考察了内战影响的持续性，发现其影响随时间高度持续且随冲突持续时间增加而增强。研究使用了 142 个国家 1989-2006 年的数据，发现内战可使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减少超过 40%。编译如下：

一、介绍

国内冲突是贫穷国家普遍存在的暴力形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57%的卷入内战的国家在战后至少经历过一次冲突。Collier & Sambanis（2002）将此称为冲突陷阱：一旦一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它就更有可能遭受更多的暴力。这种普遍的战争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削弱作用。内战使发展中国家平均损失了 30 年的 GDP 增长，贸易需要 20 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因此，重要的是要了解将内部紧张局势升级为国内冲突的经济成本。本文旨在考察国内冲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它量化了国内冲突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并探讨了结构性引力模型中的潜在机制。

Martin 等人（2008a）研究了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国内冲突风险，他们确定了国际贸易和国内冲突的两种可能机制：威慑机制和保险机制。根据威慑机制，贸易开放降低了国内冲突的风险。国内冲突通过增加贸易成本（由于道路和基础设施的破坏、边境关闭、无视法治等）抑制了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预期收益代表着国内冲突的机会成本，这会让政府和叛军都不敢挑起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大的贸易开放是国内冲突的威慑。根据保险机制，如果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冲突的风险。这降低了国内冲突的机会成本。本文对威慑机制和保险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威慑机制，考察的是国内冲突是否破坏国际贸易，以及更激烈的国内冲突是否对贸易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在保障机制方面，考察了在国内冲突中国际贸易能否替代国内贸易。

本文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内战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持续性。内战的破坏性可能比国际战争更大，尤其是在长期内。尽管国际战争使用了更先进的战争技术，导致更高的伤亡率以及基础设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大破坏（Collier, 1999），但内战可以通过破坏诸如法治和财产权等制度来削弱国家（Herbst, 1990; Collier, 1999）。内战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削弱信任并加深社会内部的种族和宗教分歧（Collier, 1999）。持续的冲突会改变人口的风险偏好、信任度以及对市场参与的偏好（Callen et al., 2014; Cassar et al., 2011）。事实上，长期的暴力冲突可以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长期“税收”，导致资本形成减少以及资源在各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D' Souza, 2014）。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

经济表现不佳，尤其是对国际贸易而言。Martin 等（2008a）发现，内战对贸易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并且在冲突爆发后的 25 年里仍然保持在约 40% 的水平。

本文还研究了国内冲突对未卷入冲突的邻国贸易的溢出效应。邻国的国内冲突会破坏贸易道路和关闭边境，从而增加贸易成本。如果叛乱分子控制了道路，跨国运输货物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一个国家在货物运输上对邻国的依赖越大，这种影响就越重要。例如，如果它是内陆的。相反，邻国内部冲突的积极溢出效应也可能通过贸易转移发生，特别是如果一个国家距离冲突足够远，被认为是安全的。本文区分了发生在相邻地区和非相邻地区的民事冲突。此外，它还着眼于邻国冲突对内陆国家的溢出效应。

本文的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在结构引力模型中正确考虑多边阻力项（MRT）来估计内战影响的论文。由于内战变量因国家和年份而异，因此无法同时包含变量和方向性的时间变化固定效应。该论文采用 Heid 等人（2017）和 Beverelli 等人（2018）概述的新方法来识别和估计单边变量对双边贸易流动的影响。他们建议将国内贸易流动以及国际贸易流动都纳入考量，以便估计国家特定效应。

其次，通过衡量国内内战的直接影响以及内战对邻国的溢出效应，这篇论文完整地呈现了内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接壤国家的冲突溢出效应（Qureshi, 2013），而本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非接壤的邻国。这些国家与出口国处于同一地区，但与出口国并不接壤。为此，论文利用了“主要政治暴力事件数据集”（MPEV）中丰富的数据，该数据集区分了接壤和非接壤的冲突。

第三，论文研究了不同类型内战对贸易的影响。具体而言，它考察了 MPEV 数据集中识别出的两种内战类型：种族内战与政治内战。种族内战是指国家与某一特定种族群体之间的冲突，例如缅甸正在进行的种族战争；而政治内战则包括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

这篇论文探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国际贸易与武装冲突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Martin et al., 2008b）。然而，在内战的情况下，内生性和反向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内战只影响一个国家（出口国或进口国），而贸易是在国家对（双边）层面定义的。因此，双边贸易流动如何影响国内冲突并不明显。¹ 为了缓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论文还通过纳入丰富的固定效应（出口国-时间、进口国-时间以及国家对）并滞后自变量，采取了若干措施。

这一实证分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内战对贸易关系极为不利。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内战使其国际贸易相比国内贸易减少了近 40%。此外，内战的影响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持续性，并且随着内战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研究还发现，种族内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负面且显著的，而政治内战的影响则不

显著。就溢出效应而言，结果表明，无论邻国是否接壤，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都会因邻国卷入内战而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如果一个接壤的（非接壤的）邻国卷入内战，国际贸易最多会减少 12%（6%）。对于内陆国家来说，内战的溢出效应甚至更强。

本文涉及关于国际贸易与武装冲突之间双向关系的文献。Martin et al（2008b）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预测，双边贸易较多的国家发生国家间战争的概率较低，而从事多边贸易的国家发生国家间战争的概率较高。数据支持模型的预测。事实上，经验证据表明，双边贸易较多的国家不太可能参与国家间冲突，这是一种负相关关系（Polachek, 1980; Martin et al., 2008b）。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冲突破坏了贸易。Pollins（1989）构建了一个贸易模型，其中进口商考虑了进口的价格、质量和原产地及其与出口国的关系。他发现了双边冲突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其他论文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布隆伯格公司 Hess（2006）估计恐怖主义、内部和外部冲突对贸易的影响为 30% 的关税。马丁等人（2008b）估计在国家间冲突期间贸易下降 22%，并发现负面影响在冲突结束后持续 10 年。关于贸易和武装冲突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冲突。它专注于国际冲突（Glick& 泰勒, 2010; Martin et al., 2008b），或将内部和外部冲突归为一类（Blomberg& 赫斯, 2006 年; 德索萨等人, 2018）。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Martin et al（2008a）。研究了贸易开放与国内冲突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贸易开放阻止了最严重的内战，但也增加了小规模冲突的风险。他们估计，国内冲突对同期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非常持久。据估计，在冲突的第一年，贸易下降了 25%，在冲突爆发 25 年后，贸易仍然下降了 40%。

这篇论文也与关于冲突对未卷入冲突的邻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关。事实上，冲突的负面影响并不仅限于卷入冲突的国家。先前的研究发现冲突对邻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存在负面溢出效应（Ades & Chua, 1997; Qureshi, 2013; De Groot, 2009; De Sousa et al., 2018）。对于距离冲突较远的国家，即那些被认为足够“安全”的国家，也存在一些积极溢出效应的证据（De Groot, 2009; De Sousa et al., 2018）。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贸易从受冲突困扰的国家重新导向同一地区更和平的国家，这些国家更有可能拥有相似的资源（De Groot, 2009）。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 2 节介绍了所使用的数据以及关于国内冲突和贸易的典型事实。第 3 节简要回顾了结构引力模型，并解释了所使用的实证策略。第 4 节讨论了所获得的结果。第 5 节总结。

二、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涵盖了 1989 年至 2006 年间的 142 个国家。本文使用了贸易、生产和重力相关数据以及国内冲突数据，这些数据将在本节中进行解释。

首先，双边贸易数据来自 CEPII 提供的 BACI 数据集。贸易流动通过出口国 i 、进口国 j 、产品类别 k 以及年份 t 来识别。该数据集提供了贸易流动的价值信息（ v ，以千美元为单位）。为了本文的目的，贸易流动在国家对-年份层面进行了汇总，从而得到年度双边贸易流动。其次，生产和国内贸易流动的数据来自 CEPII 提供的 TradProd 数据库。国内贸易流动是通过从一个国家的总生产中减去其出口得到的。数据以 26 个工业部门的部门层面提供。同样，这些数据也在国家-年份层面进行了汇总。第三，标准引力变量来自 CEPII 的引力数据集。它提供了诸如进口国和出口国的 GDP、双边距离、共同语言、殖民联系等变量的信息。将这三个数据集合并后，得到了 1989-2006 年期间 142 个国家的贸易、生产和引力数据。

最后，为了衡量内战，本文依赖于系统和平中心（CSP）提供的“主要政治暴力事件数据库”（MEPV）。该数据集涵盖了 1946-2019 年期间 174 个国家的 329 次武装冲突，涵盖了这一时期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武装冲突。本文关注的是有贸易和生产数据的国家和时间段，即 1989-2006 年期间的 142 个国家。

根据 MEPV 数据集，如果存在“有组织群体系统且持续地使用致命暴力，并在一个事件过程中导致至少 500 人直接死亡”，则该武装冲突被视为一次主要的政治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分配了一个时间段，包括冲突的开始年份和结束年份。同时，每个事件还被赋予一个从 0 到 10 的十一级量表上的强度评分，其中 10 表示最高程度的暴力，而 0 表示在特定年份内没有发生冲突事件。每个事件的强度评分代表了“对直接受影响社会的暴力全面影响的评估”。政治暴力的影响包括“死亡和伤亡、资源枯竭、基础设施的破坏以及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其他方面，例如对个人的心理创伤以及对受影响社会身份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文化的不利变化”。该强度评分在不同事件之间以及在不同时期都具有可比性，从而允许对发生在不同国家和/或不同时期的不同事件进行比较。此外，如果在单个国家的单一年份内发生多个事件，则将每个事件的评分相加，以得出一个总分。该数据集提供了关于每个国家和每个年份的武装冲突的存在以及它们的总体强度评分的信息。

该数据集识别了两种类型的武装冲突：国家间冲突和国内冲突/内战。国家间冲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而国内冲突/内战则发生在一国内部，政府与一个或多个反对派团体之间。本文关注的是内战。在 MEPV 数据集中，内战被分为两类：种族冲突和政治冲突。种族内战涉及国家政府与一个独特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冲突；一个例子是也门内战，国际承认的政府与胡塞叛军之间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政治内战涉及国家与政治对手团体之间的冲突，例如利比亚内战，民兵组织和政府为争夺石油收入的控制权而战斗。该数据集还区分了国内暴力和内战。国内暴力指的是“使用工具性暴力但不一定有排他性目标”的暴力事件。相比之下，战争涉及“不同、排他性群体之间的暴力，意图单方面

解决争端”。国内暴力与内战之间的区别似乎复杂且有些武断。因此，本文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而是使用“内战”这一术语，将两者合并在一起。

MPEV 数据集为每个国家识别了其邻国的列表，这些国家与之共享连续的陆地边界或宽度不超过两英里的水域边界。数据集为每个国家每年提供了经历内战的邻国数量以及这些冲突的整体强度评分。此外，该数据集将世界划分为 10 个地区：西非、北非、东非、南非、中东、南亚、东亚、南美洲、中美洲以及欧洲/北美。每个国家被分配到一个地区，数据集提供了每个地区每年涉及内战的国家数量以及这些冲突的整体强度评分。因此，对于每个国家，该数据集提供了关于国内内战、其邻国的内战以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相关的地区的内战的信息。然而，地区评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跨地区国家是指被分配到多个地缘政治区域的国家，其地区评分是这些区域评分的平均值。此外，由于岛屿国家与武装冲突的地区效应隔离，因此被分配地区评分为 0。

表 1-3 为 MPEV 数据集提供了一些描述性统计信息。该数据集涵盖了 1989 年至 2006 年期间的 142 个国家。表 1 描述了内战和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区别。样本中的国家在所涵盖的期间内并未经历太多暴力事件。然而，内战比国家间冲突更为常见。事实上，有 18% 的国家经历了内战，而仅有 2% 的国家经历了国家间冲突。图 1 显示了随时间推移，经历冲突的国家比例的变化。在所涵盖的期间内，经历国家间冲突的国家比例略有上升，但这一比例仍远低于内战所观察到的比例。如前所述，冲突的强度是在 1 到 10 的量表上进行衡量的，考虑了暴力对直接受影响社会的影响。内战（分别为国家间冲突）的平均强度为 3.25（分别为 2.85），这表明内战平均更具破坏性。内战和国家间暴力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们的持续时间。内战更具持久性，平均持续时间为 15.25 年，最长可达 59 年。国家间冲突平均持续 3.6 年，最长为 15 年。根据图 2，内战的平均持续时间似乎随时间增加，而国家间冲突的平均持续时间则相对稳定。

表 2 关注的是邻国冲突的溢出效应。在给定的一年中，一个国家平均有 0.79 个接壤的邻国卷入内战，相比之下，卷入国家间冲突的接壤邻国平均只有 0.1 个。接壤内战的平均强度为 2.09，而国家间冲突的平均强度为 1.07。对于地区变量，一个国家在给定的一年中平均有 3.66 个地区内的邻国卷入内战，相比之下，卷入国家间冲突的地区内邻国平均只有 0.33 个。表 1 和表 2 显示，内战比国家间冲突更为频繁、激烈且持久。事实上，内战是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暴力形式。

根据表 3，在样本国家中，有 13% 的国家卷入了种族内战，而 6% 的国家经历了政治内战。种族冲突的强度略高于政治冲突，并且更具持久性。种族内战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16.79 年，而政治内战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9.77 年。图 3 显示，在该期间内，经历任何形式内战的国家比例有所下降。然而，图 4 显示，种族内战的平均强度呈上升趋势，而政治内战的平均强度则呈下降趋势。图 5 显示

了这些冲突平均持续时间的类似趋势。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战变得更加具有种族动机，更加激烈且更具持久性。

三、结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内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它使用了 1989-2006 年期间由 BACI 数据集提供的国际贸易和生产数据来开展实证分析。此外，它还使用了同一时期来自 MPEV 数据集的内战数据。为此，论文估计了一个包含出口国时间、进口国时间和国家对固定效应的结构引力模型。方向性时间变化固定效应的存在对于获得一致且可靠的估计至关重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像内战这样的国家-年份特定变量已无法再被估计，因为它们被固定效应吸收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论文采用了 Heid 等人（2017）和 Beverelli 等人（2018）概述的新方法，使用国内贸易数据来识别内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文发现，一个国家的内战对贸易流动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平均而言，给定年份的内战会使当年的国际贸易减少超过 40%。此外，这种影响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持续性。在区分政治内战和种族内战的基础上，本文表明种族冲突对贸易的破坏性大于政治冲突。因此，内战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引发社会动荡，并加深社会内部的种族和宗教分歧。这可能导致经济环境的显著恶化，从而影响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内战对邻国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一个额外的接壤国家卷入内战会使国际贸易流动减少高达 11%，而一个额外的地区内邻国经历内战会使贸易减少 6%。

综上所述，内战是当今最为普遍的暴力形式。此外，它们往往发生在贫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这些国家愈发贫困。本文揭示了内战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极为不利且持久的影响。

本文原题为“Trade and Civil Conflicts”。本文作者 Hoda Assem 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23 年 5 月刊于 WORLD BANK GROUP。[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我们的工作时长也在增长

Wei Jiang, Junyoung Park, Rachel Xiao, Shen Zhang /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人们通常期望技术进步能减轻工作负担。但随着人工智能融入工作场所，早期证据表明了一个悖论：许多配备人工智能的员工非但没有减少工作量，反而比以往更加忙碌。本专栏研究了 AI 暴露度、工作日长度、时间分配和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尽管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和授权可以让员工更高效地完成同样的任务，但作者发现，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职业的员工工作时间更长，花在社交和休闲上的时间更少。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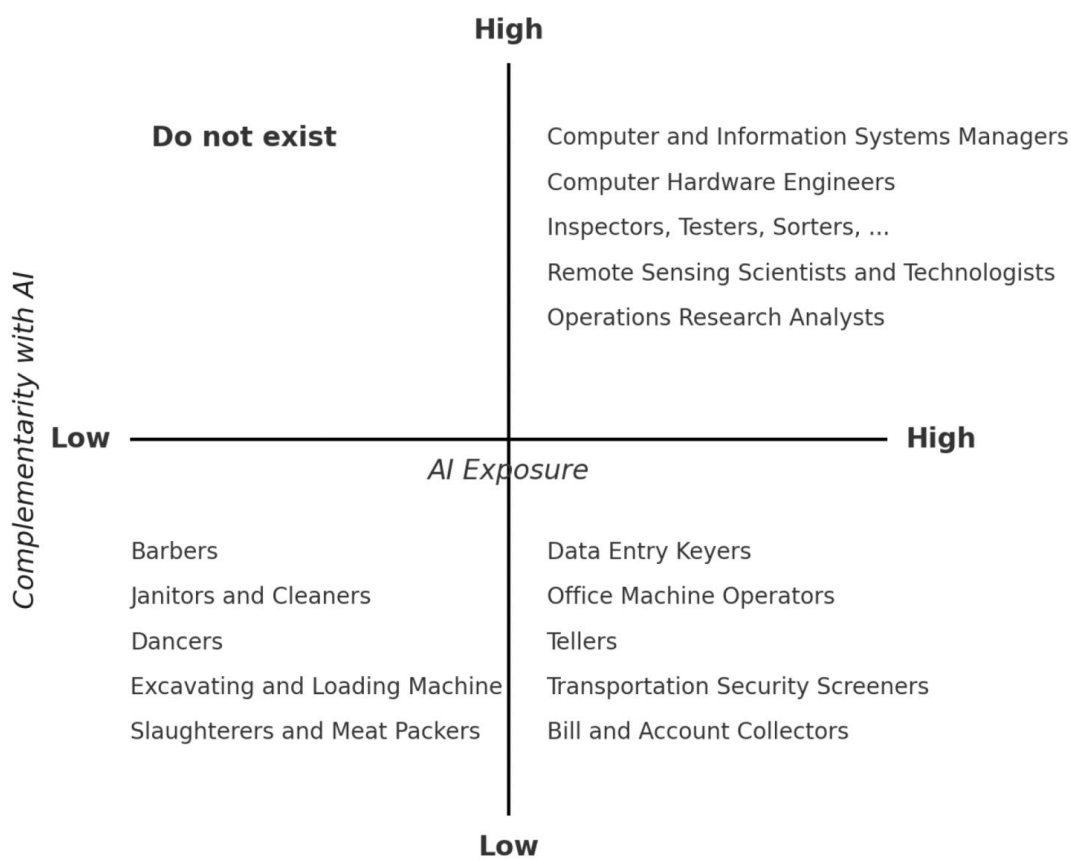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一直期望技术进步能够减轻工作负担。凯恩斯（1930）预测，到 2030 年，生产率的提高将使人们每周工作 15 小时。随着人工智能融入工作场所，早期证据表明了一个悖论：许多配备人工智能的员工非但没有减少工作量，反而比以往更加忙碌。虽然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和授权可以让员工更高效地完成同样的任务，但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职业的员工很可能工作时间更长，花在社交和休闲上的时间更少。

以 2022 年底推出的 ChatGPT 为例，人工智能的快速传播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其就业影响的担忧。大量的工作研究了人工智能如何取代一些工作职能，同时增强其他工作职能——广泛的就业边际（例如，Acemoglu 等人，2022 年；阿尔巴内西等人，2023 年；邦飞利等人，2024 年；Felten 等人，2019 年；Gazzani 和 Natoli，2024 年）。很少有人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时间分配——就业的集约边际。如果工人保留了他们的工作，人工智能会让他们工作量更多还是更少？我们的研究（Jiang et al.2025）调查了 AI 暴露度、工作日长度、时间分配和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利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数据集中（ATUS）近二十年的时间使用数据，我们将人工智能相关专利与职业描述联系起来，以构建跨工作的人工智能暴露度测量。然后，我们将补充人类劳动（提高工人生产率）的人工智能与替代人类劳动（可能取代工人）的人工智能区分开来。

如图 1 所示，人工智能补充/人工智能替代的暴露度在不同职业之间差异很大。最前沿的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生物信息技术人员和管理分析师，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力，而不是替代劳动力。相比之下，像数据录入员、出纳员和办公室机器操作员这样的工作面临着很高的人工智能替代风险，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与人工智能之间几乎没有互补性，其面临着被取代而不是增强的风险。与此同时，舞蹈演员和理发师等职业处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底层，基本上没有受到人工智能进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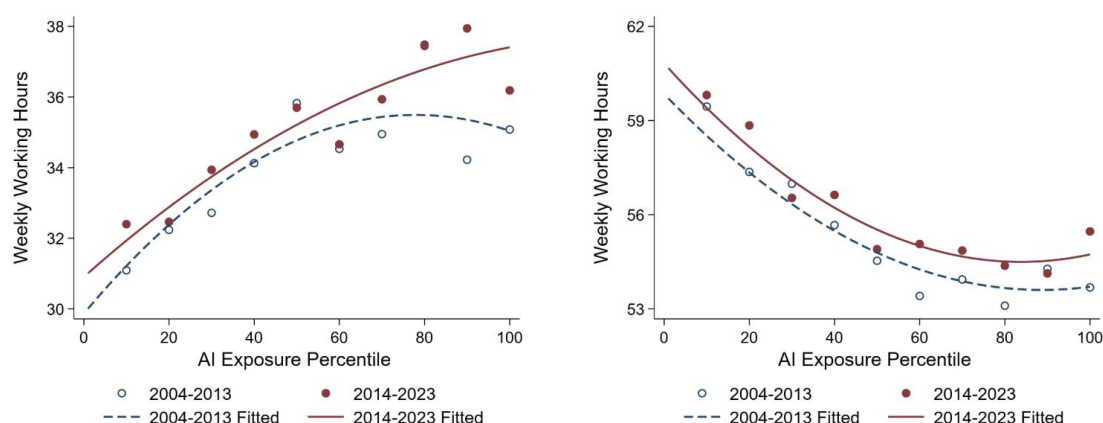
图 1:与人工智能的互补性



第三类人工智能暴露——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捕捉监控技术如何跟踪员工的努力。这一框架允许审查人工智能是否延长或缩短工作日，以及这些影响是否因劳动力市场而异。

图 2 总结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模式：人工智能暴露度越高，则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越短。在 2004-2023 年期间，从事人工智能密集型职业的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比那些接触人工智能较少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更长。人工智能暴露度从第 25 个百分位数增加到第 75 个百分位数，则工人每周增加 2.2 小时的工作。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这表明随着人工智能嵌入工作场所，其对工作时间的影响也会加强。这与人们的期望——即自动化能够使工人更快地完成任务并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背道而驰。

图 2:每周工作时间和 AI 暴露



ChatGPT 的引入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并作为一个自然实验（Hui et al.2023）。在 ChatGPT 发布后，更多接触生成人工智能的职业的工作时间立即增加。与较少接触生成人工智能的工人（如轮胎制造商、井口泵和外科助理）相比，高接触职业（包括计算机系统分析师、信用顾问和后勤人员）在后 ChatGPT 时期每周多工作约 3.15 小时。这一转变伴随着休闲时间的减少，强化了人工智能以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力供应的方式补充人类工作的观点。当休闲时间减少时，非屏幕活动——尤其是娱乐和社交活动——首当其冲。基于屏幕的休闲活动，如看电视和玩视频游戏，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工人更有可能牺牲需要主动参与的活动，而不是被动消费，这标志着人们转向更孤立和久坐不动的休闲时间。

两个关键机制有助于解释这一结果。首先，人工智能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为更长的工作时间创造了激励。当人工智能补充而不是取代人类劳动时，这一过程会让每一小时的工作变得更有价值。在人工智能帮助员工更高效地执行任务的工作中，如金融、研究和技术领域，这种影响最强。雇主可能会期待更多的产出；在与生产率挂钩的薪酬激励下，工人可能会延长工作时间。受人工智能影响的职业确实出现了工资上涨，这表明企业正在分享一些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更高的工资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休闲时间。相反，工人们似乎在用额外的收入来代替更长的工作时间，这一模式符合经济学原理，即当工作变得更有回报时，人们可能会选择做更多的工作。

第二个机制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性能监控。数字监控工具已经扩展，特别是在远程和混合工作环境中。人工智能能够实时跟踪员工的工作情况，从而延长工作时间。我们的研究将新冠肺炎时期作为一个自然实验——这期间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由于远程工作而激增。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新冠肺炎开始时更“远程可行”的工作在远程工作监控方面经历了巨大的改善。高度接触人工智能监控技术的职业——如客户服务代表、存货员和订单填写员、调度员和卡车司机——即使在员工返回办公室后，工作时间也会更长。这种影响在个体经营

者中并不存在，这证实了不仅仅是暴露于人工智能的工作的性质，而是雇佣的委托代理动态推动了更长的工作时间。监控增加了雇主的监督，提高了绩效预期，往往以牺牲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为代价。一些人工智能密集型职位引入了自动绩效评分，引导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避免在算法驱动的评估中落后于同行。

更广泛的问题是：谁从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增长中受益？虽然接触人工智能的工人工资可能有所上涨，但这些收益并不会转化为福祉的改善。来自 Glassdoor 的员工满意度数据显示，人工智能曝光率越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与生活平衡评级就越低。虽然人工智能可能会提高产出和薪酬，但它并不一定会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人工智能的许多生产力收益都流向了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工人。

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塑造了这些动态。首先，人工智能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被放大，工人的议价能力较低，因为只有少数雇主主导当地的招聘。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不太可能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或提高薪酬。其次，在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中（行业内的产品相似），企业有动力以更低的价格或更好的服务的形式将生产率收益传递给消费者，而不是通过减少工作量与工人分享。其结果是，虽然人工智能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但他们并不一定能收获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相应改善。相反，他们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来维持就业。

人工智能在未来工作中的作用不是预先确定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更长或更短的工作时间取决于企业如何部署该技术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我们的研究为这场辩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表明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有解放性或压迫性。人工智能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是由劳动力、产品和资本市场的激励和约束形成的。如果人工智能要改善生活，就必须采取更多深思熟虑的方法来公平分配其利益。

本文原题为“*As AI’s power grows, so does our workday*”。本文作者 Wei Jiang, Junyoung Park, Rachel Xiao, Shen Zhang。Wei Jiang 是埃默里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欧洲公司治理研究所（ECGI）的研究员和董事会成员，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助理（法律和经济以及公司金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融资与治理、技术与金融市场、法律与金融。Junyoung Park 是奥本大学商业分析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兴技术的商业价值、IT 和平台治理以及因果推理。Rachel Xiao 是福特汉姆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风险、创新、劳动力和金融以及家庭金融。Shen Zhang 是福特汉姆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院客座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风险投资和创业。本文于 2025 年 3 月发表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 (RePEc) 经济学预印本平台

简介：RePEc（经济学预印本平台），创建于1997年，由全球63个国家的100多位志愿者共同建立的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主要收集经济学领域相关工作论文、书籍/章节和应用软件等，致力于促进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目前共收录了300万篇文章，其中，预印本可免费访问全文；期刊可检索和浏览到论文题录文摘信息，部分可以免费下载全文，商业期刊则需要订购权限。

网址：<http://repec.org>